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大使日记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一九八 年六月十五日

我接到外交部干部司的通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通过任命我为驻奥地利共和国大使，并且要我开始准备在7月底或8月初到任。在5月初，外交部领导曾征求我的意见，到驻外使馆担任大使，我表示同意。我曾多年担任过驻联邦德国大使，德文还能用，而且听说现任驻奥地利大使将要离任，所以我建议到那里去工作。不久，党中央批准我担任这个职务，外交部立即向全国人大呈送了请求任命的报告。我在建国时在新华社工作，1951年10月第一次出国到朝鲜的开城采访朝鲜停战谈判，后来到南亚、西非、拉美、西欧担任常驻记者。1972年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后，我调到驻联邦德国使馆担任参赞、大使，到1977年初回国。我对国外工作还较熟悉，所以领导上考虑要我再到国外工作一次。

我很高兴担任这个职务，因为我已56岁，年龄较大了。过去，我们大使的年龄都偏大，很多已超过60岁甚至70岁了，我在70年代中担任驻联邦德国大使时已50岁，但当时在大使中是最年轻的。最近，听说同其他公务人员一样，大使的年龄也要限定在60岁了。

所以，这次可能是我最后一任了。世界各国大使的年龄很不一致，西方国家大都规定在65岁，美国的情况有些例外，有的企业界人士由于在总统竞选中出了大力因而被奖赏任命为大使，其中大都年龄偏大。大使职位虽然授权有限，但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个终身荣誉的职位，这些人钱已赚得很多，到年老时就想弄个大使当。有的政客也是这样，像美国驻日本大使曼斯菲尔德当到了70多岁。有些国家的政客在政治斗争或军事政变中失败，也被派到国外当大使，年龄也较大，苏联原来的领导人莫洛托夫当时就是驻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的大使。很多发展中国家大使的年龄都限定在60岁，只有印度是58岁，有的印度大使同我开玩笑说，我们印度人多，只能早些把位子让出来。

我对能到奥地利去工作很满意。奥地利和瑞士都是欧洲的中立国家，世界各国同它们的关系都比较好，没有太大的利害冲突和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有名的山青水秀、风景优美的胜地。各国的老大使最后一任都尽可能选择在这两个国家。当然，这两个国家也有特殊的问题，日内瓦和维也纳是除纽约外第二个和第三个联合国机构的所在地，还有许多国际组织设在这里，很多国际会议也在这里举行，国际上来往的人也很多。特别是奥地利地处东西方之间，是东西方的桥梁。不过，这些毕竟不是两国关系的问题，而是国际上的问题。而且，不少西方大国对日内瓦和维也纳的联合国机构另派多边的大使，如果有重要的谈判，也再派大使。在这种情况下，双边的大使就显得清静了。当时，我国在维也纳只有一个使馆，我要照顾双边和多边的工作，但那时我国还没有参加联合国原子能机构，一些欧洲的谈判我国也不参加，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工作也不算多。我可以做一些研究工作，而且奥地利是音乐之乡，在工作之余也可以欣赏那里的良辰美景，轻歌曼舞了。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五日

我赴任前的准备工作已做了一个月了。每天都很忙碌，除了外交部各有关部门外，中央和国务院不少涉外部门都要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首先当然是到外交部主管的西欧司和国际司，都还比较简单，因为中奥两国相距很远，没有利害冲突，也没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两国关系自1971年建立以来一直比较友好。另外，在维也纳的联合国机构都是刚迁移过来的，很多是小机构，重要的工业发展组织我国已参加，人员由外贸部派出，我兼任驻工业发展组织大使的委任书也由外贸部办理，另一个重要的原子能机构，我国还没有参加。我也去了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因为奥地利是东西方的桥梁，一些东西方会议和谈判常在维也纳举行，是世界上重要的听音哨之一，我国不参加这些会议和谈判，但在当地听到一些消息也是有用的。

我国驻奥使馆已有了商务处、武官处、文化处以及工发处，教委由于留学生增加和交换老师，也准备设立教育处。奥地利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工农业都较发达，我国“文革”后第一个林业的法律基本上是根据奥地利的林业法制定的。奥地利主要是希望发展同我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所以同外贸部的关系最多，我谈的时间也最长。

现任大使已从维也纳回国了，我立刻去拜访了他，同他谈了两次，交代了工作，他说的有关驻在国情况、两国关系和使馆内的情况对我是很有用的，有些问题还要请示部领导。

我还要用不少时间去探望使馆各个处负责人的夫人和家属，问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因为当时使馆的女同志少，甚至一个都没有，外国人称我们是“和尚庙”。还有一些同志家里有特别困难的也要去一下。我自己家里也有一大堆事要料理，大女儿一个多月后要分娩，小女儿刚参加工作，小儿子还在读书，当然这一切主要由我老伴来做了，她要晚两三个月才走。我只能在晚上看一些有关奥地利及周围邻国的材料和书籍，做一些必要的记录。另外，也要去做几件衣服，买一些内衣皮鞋之类，当时部内发1500多元的置装费，距上次回国不到五年的还要扣除一些。“文革”后不发国外工资，在使馆吃饭不要钱，只给很少一点津贴，国内工资照发，所以很多东西都要在国内买了带去，在国外是买不起的。

在现任大使回国之前，奥外交部就已答复使馆，同意任命我为驻奥大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的任命后，外交部通过使馆照会奥外交部，就任命我为新任大使和现任大使离任的问题征求奥方意见，只有在对方答复后我方才能正式公布。现任大使就开始辞行拜会，向总统、总理及政府各主要部门、各界重要人士告别，拜会的范围要看两国的状况。现任大使离开维也纳之前，还就新任大使呈递国书的日期的问题征求奥外交部的意见。但现任大使必须先离开，然后我才可去，因为根据国际惯例一个使馆内不能同时有两个大使。几天后，使馆电告，奥外交部通知我在8月9日向总统呈递国书，因此使馆建议我在8月3日前到达维也纳。国书比较简单，主要是说任命我为特命全权大使，并请在我执行任务时给予协助，一般是由国家元首签字的，但自“文革”后我国还没有国家主席，所以由当时的总理签字。由于呈递国书的时间已定，我的准备工作就必须加快了。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我一早到了机场，准备搭民航飞机去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在那里过夜后再换机去维也纳。我虽然一再推辞，但由于我是新任，外交部西欧司

长和奥地利驻华代办仍到机场送行。在奥政府同意我的任命后，我就礼节性拜会了奥驻华代办。原来的奥驻华大使曾同我一起在联邦德国当过大使，一直很熟悉的。几个月前他辞去了大使职务，回国参加总统竞选了。我政府已同意奥新大使的提名，估计也很快要到任了。

飞机在 10 时起飞，由于北京与布加勒斯特有 7 个小时的时差，到布加勒斯特还是当地时间下午 3 时，但罗航已没有班机去维也纳，只能到第二天上午再走。过去，民航开航布加勒斯特较早，约定从那里转机到欧洲各地的中国旅客都乘罗航飞机，罗航也给予特别折扣。即使当时中法已经开航，后来中德也已开航，但民航仍要分一部分旅客经布加勒斯特换机，让他们在那里等一两天，除非证明有急事要赶到。我过去在这里换机已好几次了，而且我曾在联邦德国工作过，驻罗使馆由于当地供应困难，常到那里去采购，所以是很熟悉的。他们去维也纳采购的次数更多，今后见面的机会也更多了。

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

中午，我乘罗航班机到了维也纳机场，我使馆代办和奥外交部礼宾司长前来迎接。

礼宾司长代表外交部长对我就任表示欢迎，并告在 8 月 3 日他将到使馆同我商谈呈递国书事宜。我同代办一起乘车回使馆，大约 20 分钟就到。使馆在维也纳有名的梅特涅街上，在维也纳没有专门的使馆区，只有梅特涅街及其周围有不少重要的使馆，梅特涅是 19 世纪上半叶在欧洲政治风云中炙手可热的奥地利帝国的首相，在拿破仑被打败后，他提出召开欧洲君主的维也纳会议，力图维持欧洲的封建秩序。他曾住在这条街东头的一座白色大理石的现在已是意大利使馆的建筑里，1848 年维也纳群众在欧洲大革命的影响下发动了起义，他从这里乘了一辆洗衣店的马车逃到了伦敦，到 1851 年才回到这里度过最后冷落孤独的岁月，在 1859 年病死。所以这条街出了名，但却是一条只有两千多米长的很狭隘的小街。我到使馆时正好是我武官刚举行过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使馆很多同志都在大厅旁边的备餐间里洗刷杯盘。这是我们驻外使馆的特色，不管是招待会、宴会，还是打扫、清理等活，都靠大家动手。

我参观了使馆在 1972 年买下的原来是一个奥地利贵族所有的古色古香的四层大楼房。

拱形的大木门，过去走马车用的高大门廊，深红色大理石楼梯引向二层楼上的会客厅，金色图案的墙壁，彩色玻璃的壁灯，淡黄色大理石的大壁炉，房顶上大幅众多天使游戏场面的油画，显得很有气派。两边是大小会客厅和餐厅，各个厅的大门都可打开连在一起，举行上千人的招待会也不会太挤。我们的这所房子，同对面的联邦德国使馆，东边的英国大使官邸，尼日利亚使馆当年都是梅特涅官邸的私人花园，梅特涅死后不久，他的子孙就把官邸和花园都卖掉了，一些奥地利贵族就在花园里修建了这些房子，并且把花园的小径修成了小街，称为梅特涅街。我使馆在 1971 年与奥地利建交后第二年买了这个房子，价钱很便宜，但已很陈旧，作了很大整修。当时还在“文革”期间，有的同志主张把房顶上的那幅油画取下来，另一些同志反对，因而这幅油画没有受损。现在仅仅这幅画的价值，就超过了房子的买价。

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

奥外交部礼宾司长来访，最后商定在 8 月 9 日向奥总统基希施莱格呈递国书。当天上午，有三位大使将呈递国书，按照大使到达维也纳的先后，

我是第二个，从 10 时到 11 时。

基希施莱格是在 1974 年担任总统的，任期 6 年，刚刚在 8 月 5 日再次当选。他上任之后，简化了呈递国书的程式，取消了在呈递时大使致颂词和总统致答词的惯例。过去，在外交上有互相致词的惯例，因此新大使赴任之前在国内要准备好颂词的文本，到达后与对方的礼宾司长交换总统答词的文本。当然，双方要说的都是友好的话，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两国关系不好或者在有些问题上不一致，就会产生分歧，从而不得不请示各自的领导，作双方都能接受的修改。近年来，许多国家已取消了互相致词的做法，只有对方提出要致词的除外，我国也是一样。

根据国际惯例，新大使在呈递国书之前不进行正式的外交活动，仍由代办参加。所以我有 5 天的时间，除了使馆内部的工作和拜访一些不属政界、外交界的老朋友外，可以认识一下我将要工作多年的维也纳。下午，我先去了新到维也纳的人必去的西北郊的卡伦山上，眺望全城的景色。这个古老的城市沐浴在初夏明媚的阳光中，显得更加诗情画意。淡淡的雾霭给她蒙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内城里皇宫、议会、教堂、剧院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圆顶和尖塔好像是她头上的珠宝，多瑙河在城外缓缓地流过，恰似束在她腰肢上的一条玉带，山冈上苍翠欲滴的维也纳森林更给她披上了一件绿袍。这座文化名城在欧洲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也孕育了不少音乐家、戏剧家、诗人、画家、建筑家、雕塑家。

奥地利现在是一个只有 8 万多平方公里，700 多万人口的小国，但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帝国。哈布斯堡王朝 1278 年在奥地利建立了统治，后来通过战争和联姻迅速扩大了领土，最盛时包括了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全部、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一部。因此，王朝有了需要和可能大兴土木修建皇宫和首都维也纳，并且发展文化艺术，音乐歌剧的事业。可是境内民族众多，矛盾激化，也给这个大帝国种下了分裂的根源。帝国在战争中接连遭到了失败，国土不断缩小，国内日益衰弱，在 1867 年帝国变成了奥匈二元帝国。最后，奥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遭到惨重失败，匈牙利宣布独立，奥地利成为共和国，帝国终于完全覆灭。奥地利又在 1938 年被希特勒用武力侵占，成为德国的一个州。希特勒失败后，奥地利同德国一样被美苏英法四个战胜国军队占领。到 1955 年奥地利同四个战胜国签订了条约，宣布成立永久中立的国家，成了东西方的桥梁。

我从山上下来就去参观了奥地利人引为骄傲的环绕内城的帝国环行大道。两边历代的皇宫、议会、教堂、剧院、音乐厅、大学等，好像都在以自己雄伟的英姿和华丽的装饰争妍斗艳；街角巷口林荫下的音乐大师包括莫扎特、贝多芬、海顿、舒伯特、施特劳斯的雕像，也使人感到了音乐之乡的诗情画意和脉脉温情。黑色的马车在小石块铺砌的大街小巷里发出马蹄清脆的响声，车夫在向客人讲述帝国盛衰的烟云，小酒店里已坐满了客人，三人小乐队到每个桌边来演奏维也纳民歌，更增加了对音乐之乡的一往情深。

我深深感到，能够到这里来工作真是太好了。

一九八 年八月九日

奥外交部礼宾司长穿着黑色燕尾服在 9 时 45 分乘黑色加长的插着奥中两国国旗的礼宾车来到使馆。我上了车，陪同呈递国书的使馆政务参赞、武官、商务参赞和两位秘书分乘使馆的两辆小车跟随在后。我和使馆的同志都穿了黑色的制服，奥方规定呈递国书时陪同的外交官不超过 5 人，穿黑色燕

尾服或民族服装。总统府在市中心的环行大道上，离使馆很近，而且有警方摩托车开道，10分钟就到。总统府秘书给我开了车门，在总统府楼前的小方场上，穿着灰色军服的仪仗队已站立在那里，礼宾司长陪同我检阅了仪仗队，走过持枪行注目礼的士兵后，是奥地利军队传统的一只背着两只小军鼓的小毛驴，然后是奥地利军队的军旗，我对军旗行了礼。陪同我的外交官不参加检阅，在楼门口等候。

总统府左右各有一个门，秘书引导我们走进右边的门，登上圆形的大理石楼梯，就到了三楼的总统办公厅。

总统府是奥帝国皇帝里奥波德第一在1668年修建的浅黄色大理石的巴洛克式的宫殿，后来一直是历代帝王特别是塔雷西亚女皇的办公厅和住房。女皇在奥地利负有盛名，她在18世纪中叶国家内忧外患中继位，在位的40年中推行开明的改革政策，为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走进三楼的大门，穿过一个个金碧辉煌、画栋雕梁但并不太大的房间，其中有一间挂着女皇的画像，就是她当年的办公室，最里的一间是她的住房，现在已是总统的办公室了。总统办公室不大，后半部放着他的一张办公桌，前半部有一个小圆桌和一排木椅，是他会客的地方。我们走进进去后就站好了队，我在最前面，后面一排是政务参赞、武官、商务参赞，再后面是两位使馆的秘书。我的秘书从皮包里把国书递给我，礼宾司长就到里面总统的小办公室去，不一会，基希施莱格总统就在外交部长帕尔陪同下走了进来，我简短地说我感到非常荣幸出任中国驻奥地利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将为促进两国友好关系而努力，并且希望在执行职务中得到总统阁下的支持。

我说完后就双手把国书递交给了总统。他接受了国书，也简短地说他非常欢迎我担任这个新的职务，相信两国的友好关系将进一步发展，可以指望在执行职务中得到他的帮助。

他同我和其他同志握了手后就请我同他一起坐下。圆桌很小，他和外长、我和政务参赞就坐满了，其他的人就坐在后面的木椅上。他在5月初的选举中刚刚再次当选任期6年的总统，我首先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他也很高兴地谈到了他在1973年初作为外长访华的情况，说他对这次访问特别是周总理的接见印象非常深刻。周总理一开始就提出了许多有关奥地利经济的问题，包括多少吨钢，特种钢的比例，多少吨粮食，每公顷的产量等，他被问得狼狈不堪。他回国后多次向官员谈话，要好好研究本国的情况，包括熟悉各种数字。我们谈得非常高兴，半个小时过去了，我立刻告辞出来。

回到使馆后，使馆办公室就忙起来了，赶紧把已经准备好的外交照会发给各外交使团，通知我已呈递国书，开始办公。发外交照会也是一件政策性很强的事，在维也纳有近一百个外交使团，绝大多数同我国有外交关系，都是要发的，只有少数没有外交关系，发谁不发谁，事先要请示国内。此外，奥地利是天主教国家，外交使团的团长固定是梵蒂冈的大使，我国同梵蒂冈没有外交关系，我使馆的照会是他作为使团团长，而不是作为大使发的。

一九八 年八月十六日

我向在维也纳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汉斯·汗递交了我国政府委任我兼任驻工业发展组织大使的信件。

维也纳联合国机构有两个大的组织，一个是工发组织，我国已参加，我的委任书是由外贸部写报告国务院批准的。另一个是原子能机构，我国还没有参加，机构总干事布里克斯已在纽约向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试探过多次，了解我国是否有可能参加。工发组织主要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制订工业发展计划，训练技术人员，但经费太少，比较困难，而且美国认为工发组织不听话，威胁要退出。

汉斯·汗是阿尔及利亚人，过去在反法战争中在突尼斯边境地区打过游击，独立后长期在国外工作，担任过在维也纳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处的秘书长，到工发组织工作只有两年。

他曾多次访问过我国，对我国很友好，同我使馆工发处的工作配合得很好。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却不太满意他，说他偏袒发展中国家。他在谈话中很友好，也很坦率，特别是我谈起过去当过记者，曾到他打过游击的地区采访过，虽然还是初见，但都感到很亲切。他还谈到他有时工作很忙，只能请大使们一起用工作午餐，但经费又紧张，还要大使们自己出钱。

维也纳联合国机构中还有一些小机构，其中重要的是麻醉品管制署。当时吸毒主要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毒品的产地大部分在哥伦比亚等拉美地区，亚洲金三角地区也产毒品，但过去大部分在亚洲和大洋洲地区，美国的缉毒工作主要在拉美地区，通过联合国还比较少。还有一个重要的是难民署，当时主要是救济巴勒斯坦难民，经费极为有限。巴勒斯坦难民很大一部分在黎巴嫩南部，我在 50 年代末曾去采访过这些难民营，他们都住在木棚泥墙的小屋子里，食物很差，用水困难，生活非常悲惨。此外，还有妇女、青年等的组织，都很小。

这里的人们说，维也纳的联合国机构是克赖斯基总理从本国安全考虑连请带拉到这里来的。

奥地利在 1938 年被希特勒军队侵占，成为德国的一个州。二战结束后，奥地利被美苏英法四个战胜国占领，到 1955 年奥地利同四国签订国家条约，宣布成为永久中立的国家，四国的军队才撤走。但奥地利仍受到苏联和美国冲突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成为它们的战场。富有经验的克赖斯基总理一直想使维也纳成为继纽约、日内瓦之后第三个联合国机构的中心。

他花费了 57 亿奥先令在多瑙河南岸修建了维也纳国际中心，占地 17 公顷，建筑面积 23 万平方米，可容 3500 人办公。大厦建成后，他在 1979 年 8 月 23 日正式交给联合国使用，每年只收一个先令的租金（相当人民币 8 分钱）。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交接仪式上代表联合国接受了大厦，并且把象征性的一个先令交给奥财政部长安德洛希。一些联合国机构搬进了大厦，人们称之为联合国城。

奥政府还给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各国驻联合国组织使馆的外交官特别的优待，在大厦内开设了烟酒和化妆品的免税商店，除总干事和大使不受数量限制外，其他各级人员都有不同的数量限制。我还抽烟，也得到了不少的好处。

一九八 年八月十七日

8 月中，奥地利政界、经济界和外国使馆的大使到外地休假的已多起来

了。奥地利从8月初开始休假，到9月初结束。我呈递国书后，抽时间拜访了外长和其他两位部长以及少数几位大使，大多数要等休假季节结束后再去了。维也纳的旅游季节也开始了，多瑙河畔和维也纳森林脚下的宾馆、餐厅和酒店游客如云。奥地利曾是一个大帝国，历代帝王特别是塔雷西亚女皇大力提倡音乐歌剧事业，因而一直是欧洲的文化之邦和音乐之乡。

因此，每年从欧洲和世界各地来的游客多达2000多万人，等于奥全国人口的3倍，每年旅游收入六七十亿美元，是奥地利一项重要的收入。

今天上午，我应奥地利朋友的邀请从维也纳上船游览世界有名的多瑙河。我同所有初来这里的人一样，受了世界名曲《蓝色多瑙河》的影响，以为这条河流是蓝色的，但第一眼看去却不免有些失望。在我们脚下的河水却是黄褐色的，显然已受到了污染，鱼类已经不能食用，人们早已不敢来游泳了。奥地利朋友大概经常碰到这个情况，微笑着对我说，过去有人作过统计，多瑙河从来也没有蓝色过。在古老的歌谣里曾有过蓝色的提法，最早见于出生在多瑙河边的18世纪的匈牙利诗人卡尔贝克的诗歌中，提到“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多瑙河“我祖国的蓝色的眼睛”。过去，多瑙河在城市的郊外流过，有一条运河穿过城内，现在城区已扩大到河边了。多瑙河从德国南部发源，从西北方向进入奥地利，穿过东阿尔卑斯山的最后一批冈岭，到维也纳就是一泻千里的平原了。所以，多瑙河在维也纳最美丽的一段是在上游80多公里的山区。

我们乘坐的白色两层舱的大游船向西逆流而上，山口上水势湍急，船头上发出哗哗的响声。进入山区后，两岸山清水秀，绿意盎然，山坡上是连片的绿色的葡萄园，山脚下是古色古香的村镇和果树园，许多的小酒店已挂出了旗帜和招牌，宣告葡萄酒节已经开始。船行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这个山区最古老的小镇狄尔斯坦因。这里是盛产最好葡萄酒的地方，还有一个很古老的酿酒学校。好客的校长邀请我们到他们的同样很古老的酒窖去品尝葡萄酒，而且有当地的民族乐队伴奏。我们的午餐一共花了3个小时，尝了15种葡萄酒，又吃了大肉大香肠的农家饭。校长是酿葡萄酒的能手，每尝一种酒都能讲出一个这种酒的来历的故事，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下午日已西斜，我们要回船去了，校长还一定要送到码头。游船顺流而下，速度很快，不断挥手的校长很快就看不见了。

在阳光的照射下，我们体内的15种葡萄酒更增加了热力，多瑙河水欢乐地眨着眼睛在我们的船边跑过去，好像在呼喊着想同我们比赛。两岸的山岭也张开了手臂，似乎也要我们尽情地欣赏这大好河山。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呀！我终于感到，我已看到多瑙河的蓝色了。

一九八九年九月九日

我从9月初休假季节结束以来抓紧时间拜会了国民议会议长和6位部长，在政府主要的方面，除了克赖斯基总理之外，已经差不多了。使馆已同总理办公厅进行了联系，因为总理要出国访问，拜会的时间要过几天才能确定。我已拜会了维也纳市长，其他8个州以后再会。不过还有很多大使没有拜会，要尽可能在这几天内完成。上任拜会是一件政策性很强的事，搞不好要犯错误，去还是不去，早去还是晚去，反映我国对这些国家的态度，对方对此也很注意。可是在维也纳，大使特别的多。主要的东西方国家有3个大使，一个是驻奥的双边大使，一个是驻维也纳联合国机构的多边大使，这些我都是要去拜会的，还有一个是参加中欧裁军谈判的大使，这个谈判自1973

年 10 月开始，当时估计不会超过两三年，但到我上任时已有 7 年了，好像还看不到边。我国不是谈判的参加国，本来我是可以不去的，但考虑到今后能够了解一些东西方谈判的情况，也决定要去一趟。不少国家有两个分别驻奥和驻联合国机构的大使，大多数国家只有一个大使。常有人开玩笑说，维也纳除了通货膨胀外，还有“大使膨胀”。奥外交部的外交官名册已是厚厚的一本，听说还有不少美、苏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没有列入名册呢！

奥地利人常说，维也纳有三多，外交官多，情报人员多，商人多。维也纳由于所处的地位，战后以来一直是东西方会议和谈判的理想场所，也是各种国际会议和专业会议的理想地方。据统计每年各种会议有一万多次，参加者有几万人，很多会议参加者比会场的座位还多。奥过去是老大帝国，留下了不少可供开大会的宫殿大厅，听说现在已稍感不足，已在开工修建新的会议中心了。当然，双方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情报间谍机构更多得不可胜数，情报人员也弄不清有多少，据当地报刊说在奥地利有十万间谍之多。只要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各种活动就更频繁和紧张，外交市场上谣诼纷纷，一日数惊。

双方许多常驻的和临时的记者四处奔走，翻云覆雨，制造一个又一个疑阵来。还有不少两面间谍，待价而沽。从事东西方贸易的公司也多得难以统计，西方有牌有号的不下五百家，东方正式注册的也有几十家，还有很多皮包公司做了几笔买卖后就很快消失。双方搞窃听和跟踪，用金钱和美人计，搞突击和策反，施尽了浑身解数。当然双方也都有失手的时候，被抓住了把柄，好在奥地利是永久中立的国家，不至于闹出太大的问题来。

奥地利成为东西方的桥梁，给它带来不少的好处，也增加很多的麻烦。奥地利主人很好客和耐心，把各种会议和谈判安排得井井有条，对重要的客人也少不得在多瑙河畔和维也纳森林的餐馆和酒店里招待一番。奥外交部的礼宾官员常常很礼貌地用外交口吻说：“我们同他们相处得很好，他们在这里也生活得很愉快。”但音乐之乡的深情厚谊和轻歌曼舞也掩盖不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明争暗斗，常常为这为那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把主人也骂了进去，说奥方偏袒对方，对他们“不中立”了。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八日

下午 3 时，克赖斯基总理在总理府接见了。总理府在总统府的侧面，是一座在 17 世纪初鲁道夫第二皇帝修建的大宫殿，右边是总理府，左边是外交部。总理府曾是梅特涅在担任帝国首相时的首相府，在拿破仑被打败后，他在 1814 年 10 月到 1815 年 6 月在这里召开过欧洲大小帝王君主的维也纳会议，为了搞平衡和拉拢，常常举行盛大宴会舞会，因此历史上有“维也纳在跳舞”的讥称。我沿着弧形的白色大理石的楼梯走上二楼，大门内的一间大会客厅就是当年维也纳会议举行大会的地方，现在是内阁会议的大厅。再进去是总理的办公室和会客室，也是当年梅特涅首相起居的地方。

克赖斯基总理已 69 岁，年龄还不算太大，但可能由于过去的经历和工作，显得很年老体弱，个子矮小肥胖，走路有些蹒跚，可是目光犀利，显出阅历丰富，城府很深。他同西德的勃兰特一样，是国际上有名的老社会党人。他 1911 年生 in 维也纳，1936 年和 1938 年由于参加社会党活动两次被捕，1938 年希特勒军队入侵时逃亡瑞典，直到战后才回国。他从 1959 年到 1966 年担任外长，1967 年起当选奥社会党主席，1976 年又任社会党国际副主席。他思想敏锐，经验丰富，有决断力，对国际问题很熟悉，在国际上很有名望，

因此在国内有“克赖斯基太大，奥地利太小”的说法。他从 1971 年起担任了两届八年总理职务，在 1979 年又第三次当选。

在外交界中都知道，克赖斯基总理在接见外国客人和使节时，从不作一般性的形势估计，而是开门见山就一些重大国际问题提出他的看法，当然人们并不一定同意，但引起深思。对这一点，我印象很深。他在同我谈话中没有说一句在外交界中常有的客套话，而是直接提出了中国印度关系问题，他说为什么两国关系那么紧张呢，中国、印度都是亚洲的大国，对亚洲和平负有很大的责任，应当设法改善关系。他又谈到了美国，他说美国是世界的大国，对美关系十分重要，应当注意搞好关系，不过也不能什么都附和它，都听它的，这样也不能搞好关系。他说话很简短，只谈了不到一个小时，而我不但对他的谈话，而且对他的性格和作风，印象很深刻。

他自担任总理后，采取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加强了奥地利在国际上的地位，并且发展了奥地利的经济。他一方面加强同西方包括美国的关系，但不附和美国的侵略政策，反对美国侵略越南政策，抨击美国的中东政策，而且由于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邀请阿拉法特访奥，而同美国闹得很僵。他另一方面改善同苏联东欧的关系，增加同它们的经贸合作，但也抨击苏联的侵略行径，绝不放松对它的警惕。可是，近年来他身体日益衰退，而社会党内对接班人问题也有分歧，引起了普遍的忧虑。

一九八 年十月一日

今天是国庆节。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在昨天中午举行过，因为已有三个国家把 10 月 1 日作为国庆节，除了我国外，还有尼日利亚和塞浦路斯，维也纳的塞浦路斯使馆一般不举行招待会，所以我使馆每年要与尼日利亚使馆协商，分别在 9 月 30 日和 10 月 1 日举行。这次国庆招待会也是我的到任招待会，到的客人很多。我呈递国书后正值夏季休假，到假期结束时离国庆节已没有几天，只能把国庆招待会同我的到任招待会合并举行。我们使馆举行招待会为了节约经费，都要靠大家一起动手，特别是国庆招待会客人多，而且是冷餐招待会，更要忙上很多天。昨天大家大忙了一阵，今天正好休息一天。按部内通知，从 10 月 1 日起给大家增加一些津贴，虽然增加得很少，大家这些年来已习以为常，也感到很高兴。我原来每月 115 元人民币，增加到 150 多元，最低的工勤人员由 50 多元增加到近 70 元。

国内很多的同志以为我们外交人员来回乘飞机，坐大汽车，穿西服，同别人干杯，好像很舒服，很优裕，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国外工作上紧张的，生活上是俭朴的。

在“文革”开始时，中奥还没有建交，只有商务代表处，奥地利的极“左”派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说代表处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资产阶级化，穿高档服装，坐高级汽车，出入资产阶级场所，专同资产阶级打交道，结果领导同志被批斗，大批外交官被调回国参加运动，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当然，我们的同志在工作和生活并不是无可指责的，但这封信是极“左”思潮在国外的反应，所说的事是极端夸大和歪曲了的，严重丑化了中国外交人员的形象。

建国以后，使馆工作人员和其他驻外人员的工资是比较高的，接近第三世界外交人员的水平，但同国内生活水平相差太大，因此很多老大使向部内提出适当减少国外工资。

后来，国外工资不断受到国内运动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在反右派运动

后，降低了 60%，几个月后感到降得太多，又回升了 10%。当时的工资只比国内多 3 倍左右，因为在国外吃饭穿衣开支比国内大，家属的费用也要多，不能算高工资。到了“文革”，大批特批高工资，决定取消国外工资，改为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伙食尾子不发钱，只发水果、蛋糕之类实物，供应从洗衣粉到卫生纸等，洗外衣和外出理发按国内价格报销，国内工资照发，国外只发很少津贴。外国人说我们是“小费工资”，实际上比小费还少。我们使馆一年的开支还抵不上日本大使一年的工资。我从 1974 年担任大使后一直是每月 115 元人民币的津贴，终于到今年（1980 年）10 月 1 日起将增加 30 多元。同志们虽然感到很拮据，要积一年的津贴才能买一台 18 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有一些意见，但仍兢兢业业地工作，说明了我们的驻外人员是能够体谅大局的。

三

一九八 年十月五日

在拜会各国驻奥大使和驻联合国大使大体上结束以后，我今天上午第一个拜会了参加东西方中欧裁军谈判的美国大使。这次谈判是美苏之间继在 1979 年正式签署的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条约之后的一次重要谈判，反映了美苏及两个集团的矛盾和参加国的态度，我国虽然不是参加国，但仍是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美国大使是一个裁军专家，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大使。他已是第二任美国参加谈判的大使，而且在这里已有三年多了。他说谈判从 1973 年 10 月 30 日开始，原先最保守的估计也不过两三年，不管是否达成协议，可是到现在已 7 年了，还看不到什么时候能结束。

他开玩笑说，也许等不到结束，他就要退休了。他还没有等我开口，就把一厚册介绍谈判情况材料交给我。他说：“这是从谈判开始到上个月谈判的情况，请你先看一下。

不少新到任的大使，还有更多到维也纳来办事、开会和游览的美国参众议员，学者和记者来找我了解谈判的情况，如果我从谈判开始讲起，可能三个小时也讲不完，而且听的人也不一定懂。因此，我编写了这份材料，每个月再把新的情况加进去，先请来的人看一看，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找个时间再谈，打电话也可以。”

他笑笑说，现在只有荷兰大使从谈判开始以来还在耐心地工作着，其他的大使包括对方的大使都已更换了两三任，有的大使已二进宫了。对他来说，二进宫的机会也许赶不上了。谈判了 7 年，双方一步也没有动。有的大使受不了这样乏味的生活已经辞职了，还有的大使挖苦地说，他现在的工作用不着担心会失业，甚至说他的儿子将来也可以来接班了。我看他工作很忙，不断有电话来，而且我对谈判的情况也不清楚，要看一看他给我的材料，就起身告辞，约定下次再谈。

这个谈判漫长而又复杂，确实不是新来乍到的人能弄得清楚的。谈判的目的是要讨论裁减北约和华约驻在中欧地区的常规军力，正式参加谈判的

有北约的美、英、加、联邦德国、荷、比、卢；华约的苏、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双方其他 8 个国家作为观察员参加。每年进行 3 个回合，大体上是在 3、5、9 月份内开始，每个回合约两个月左右。7 年的会议双方吵来吵去，实际上只吵了一个题目，究竟华约在中欧地区有多少军力。华约报的数字是 81.5 万人，但北约不信，说应是 96 万人，批评华约故意隐瞒了 15 万人。双方互相指责，吵得不可开交，竟吵了 7 年还没有完。难怪有些报纸讽刺说，会议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开下去，会议参加者的子子孙孙也差不多可以达到 15 万人。

如果有人以为这些外交官都在吃饭睡大觉混日子过，那就太冤枉人了。他们都把这个“对话”看成是互相摸底、互相试探、互相交易的大好机会。只要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之间的活动就更频繁和紧张。维也纳是音乐之乡，又是游览胜地，他们互相邀请在多瑙河畔和维也纳森林脚下的饭馆和酒店吃晚饭，尝新酒，在华丽的国家歌剧院和音乐大厅内听音乐，看歌舞，后来又从美苏日内瓦谈判中学来了“林中散步”、“河上泛舟”之类，真是热闹非凡，大有当年欧洲君主在打败拿破仑以后举行的维也纳分赃会议的盛况。

一九八一年十月九日

我拜会了奥地利很有势力的联邦商会的老资格的会长萨林格。他在 1964 年 12 月 10 日在维也纳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代表签订了关于推动两国经济关系并互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并且在第二年中第一次访问了我国。在这一个月前，促进会在罗马也同意大利对外贸易协会签订了互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当时，在西欧地区只有法国已同我国建交，其他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建交，互换商务处是一个突破。

萨林格对我说，他非常高兴能为促进两国关系作出了贡献。在签订协议的第二年中，他率领第一个奥贸易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他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而且还是唯一的奥地利人见到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他对周总理和陈毅部长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周总理问他为什么奥地利的国营企业很多，而且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例，使他大吃一惊，周总理对一个小小的奥地利的情况了解得这么多。陈毅部长的元帅气度和对国际形势的高瞻远瞩，令他至今难忘。他回国后，还专门出版了一本他访华的画册。他到我拜会他时已访华了 7 次。

他接着同我谈了他对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很多意见。他说，自两国 1964 年签订协议以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发展很慢，当然在“文革”时也难，但现在进展仍不大，这几年来你们有 20 多个代表团来访问过，很多个是由部长率领的，提出了 30 多个项目，有的还签了意向书。可是，到现在连一个都没有实现，我们的企业写信打电传去，也派人去催问，大都没有答复，有答复的也是一些敷衍之词。他有些生气地说，我们的企业已花了很多的钱，不少已根据你们的意见做了项目的规划，甚至翻译成了中文。“过去谈过的 30 多个项目中只要有一个实现就可以了。”

在这种场合下，我们有外交经验的同志特别是大使都知道是很为难的，对方讲的确实都是事实，而自己心中没有多大的把握，但仍必须作些合理的解释。当然，这是我第一次拜会，还可以向对方作些解释，并且向国内有关部门报告。但如果国内企业仍不答复或者敷衍一番，我这个大使还只是作一般性的解释就很不好办了。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许多代表团组到国外参

观考察，这是很好的，但由于“文革”的长期闭塞隔绝，我们的同志到国外后看到一切都很新鲜，都想引进，而没有考虑是否可行，有无能力，在没有向国内上级请示报告的情况下就贸然向对方提一些项目，要人家做这做那，甚至同对方签了意向书，从而造成了被动。过去，周总理常说，在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上，我们要重合同，守信用，一定要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现在，这样的事情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加，常常给使馆工作造成困难。外交工作要为国内的经济合作服务，但也要有国内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才能把工作做好。

萨林格虽然有不少意见，但对我国是非常友好的。他已70多岁，前几年中了风，走路已有些不便，仍去我国多次，接见几乎所有的我国的代表团。他送了我两个有莫扎特、贝多芬肖像的小瓷盆，风趣地说奥地利是音乐之乡，大使要紧张工作，也要听听音乐，才能工作得更好。

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

月底是信使到来的日子。除了国内各部门的公务文件外，还带来了私人的信件。国内有关部门早有规定，为了保密起见，驻外人员的私人信件一律寄到外交部信使科，由他们带到国外，驻外人员的私人信件也由信使带回国内，再送邮局寄发。许多国家的外交部都有信使，但带私人信件的除了我国外，可能还有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代表团组或者驻外单位的人回国，他们的手提包里都装满了同志们托带的私人信件。

随着改革开放，驻外人员增加，私人信件越来越多，大家感到这个规定可能难以行得通了。在“文革”中还闹了一个笑话，忽然规定所有寄到国外的私人信件都要经过本单位的支部书记审查，弄得大家非常为难，特别是正在谈恋爱的年轻同志更不方便，支部书记也不愿意，不久以后就不了了之。实际上，这主要应是对同志们加强保密教育的问题。

在我们这里，信使由使馆的外交官从机场接到使馆常常是半夜了，同志们就一直等着。等信使来到后，负责文件的同志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信使带来的私人信件分发给已等在保密室外的同志们。工作万里外，家书值千金，信使给很多同志带来了好消息：孩子身体很好，读书很用功，听爷爷奶奶的话等。信封内还有一两张照片，因为按规定信件特别是照片是不能超重的。但也给有些同志带来了坏消息，孩子有病或者考试成绩不好，老人有病甚至不幸过世等，引起了很多的不安和眼泪。还有的同志特别是在谈恋爱的或者刚结婚的年轻同志没有收到来信，更是当晚难以成眠。

外交人员的家属问题特别是孩子问题，一直是一个外交人员最不放心问题。初期，使馆职务高一些的同志可以把孩子带到国外去，到入学年龄时在资本主义国家要回国读小学，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当地读完小学后回国上初中，几年后这条规定取消了。大多数同志把孩子放在本单位的幼儿园或者寄宿学校里。北京有几个寄宿学校是从延安搬来的，办得很好，对驻外人员的孩子很照顾，只要本单位开个介绍信去都收，父母出国后很放心。后来驻外人员增多，孩子也越来越多，只能进普通的学校，由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亲戚照管，也有的解决不了，只能妈妈留在国内。当时，一般工作人员不能带妻子，两年休假一次。可是，到“文革”开始时，大批特批这些寄宿学校是“贵族学校”，都改成了普通学校。

信使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每次出发两人同行，要去好几个国家，有时还要经过未建交国家，不论是在飞机上还是在火车上，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紧紧拿住装文件和信件的保密袋。他们在路上自己带饮水和食物，不吃人家的东西，也不喝人家的水，到晚上两人轮流睡觉，不能有丝毫的放松。有时还发现有偷窃、抢劫、绑架的企图，就要靠他们的坚定和勇敢来对付，坚决保卫国家的机密。信使一般只住一两天，有时当天就走。

使馆同志非常忙碌，刚赶完公家的材料，还要连夜写私人信件。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当地报纸转载了前两天英、美报纸登载的两张有关苏联克格勃间谍在维也纳接受秘密文件时失手的照片，一张是克格勃特务从巴黎到达维也纳机场的照片，另一张是他同另一个间谍在维也纳市中心咖啡馆里坐在相邻的小桌子边的照片。报纸还说明这些照片是跟踪的英国情报人员偷拍的。

这件事是在大约半个月前英国报纸最早透露出来的，但后来又有了更详细的报道。

这个克格勃的老手首先到了中立国家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然后参加了旅行社组织的欧洲旅游，到了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伦敦、巴黎，最后到了维也纳。他在一天下午四五点钟快要下班的时候来到了这家咖啡馆，拿了一只手提箱，坐在一个角落里要了一杯咖啡，就拿起一份报纸看起来。奥地利人习惯在下班后到咖啡馆去喝一杯咖啡，并且看看报刊，听听音乐。这个时候咖啡馆人来人往，正是生意最忙的时候。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一个人走了进来，拿了一只差不多同样的手提箱，坐在他相邻的小桌子边，要了一杯咖啡，也拿起了一份作为记号的同样的报纸。克格勃特务看了看他，喝完咖啡后站起来要走，拿起了手提箱，但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坐在邻桌边的那个人的。就在这一刻，穿着便衣的奥地利反情报人员一把抓住了他们。另一个人是欧洲一个小国的前外交官，想用这种换箱子的办法把北约的秘密文件交给苏联特务，但失败了。老练的英国情报人员早在克格勃间谍在赫尔辛基办理欧洲旅游的手续时就盯上了他，一直跟踪到了维也纳，一路上还偷拍了很多的照片，人证物证俱在，使克格勃大大丢了脸。

过了两天，苏联报纸公布消息说，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情报机构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了正在欧洲旅行的苏联商人，目的显然是企图诽谤和污蔑苏联，制造欧洲的紧张空气。消息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个苏联公民，并且警告苏联将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苏联公民。果然，几天后，苏联报纸又报道说，苏军逮捕了非法闯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有明显“不准进入”牌子的苏军基地的两个居住在维也纳的美国情报人员，并且没收了他们偷拍的很多胶卷。美国方面立即提出了抗议，说这两个美国商人正在那里旅游，只是迷路误入了苏军基地，要求立即释放他们。

那几天，双方互相攻击，吵得不可开交。当然，双方的外交活动也在加紧进行，好在他们在维也纳都有三个大使，联系起来是很方便的。双方都不想把事情闹僵，弄得不可收拾，而且奥地利作为中立国和主人，也希望他们尽快和解，免得自己为难。维也纳的政界、外交界、新闻界对这些事情都已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了，肯定地说再过几天，双方都会偃旗息鼓，偷偷地互相放人了事。这里的一些作家和画家常常把这些间谍故事写成通俗小说或画成连环画在报刊上连载。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我到维也纳已有3个多月了，经过同政界、外交界、新闻界的拜会和接触，对这个国际上有名的城市有了初步的认识。我原先同没有到过这里的

人一样，认为这是一个文化名城、音乐之乡，就像奥地利人常说的那样，多瑙河和维也纳森林孕育了许多的音乐家、诗人、戏剧家，而他们的诗篇又使它们更加美丽和可爱。当然，这一方面是肯定的，而且我已经开始欣赏和享受到了。但是，我也看到和感到了另一方面，即这个城市作为东西方桥梁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奥地利地处中欧，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而且在二战中战败后被美、苏、英、法的军队占领，后来作为战胜国军队撤退的条件宣布为永久中立国。由于这个特殊的地位，这里成了一个东西方进行公开和秘密交易、间谍和反间谍活动的场所，又是一个国际上观测东西方关系和国际气候的观察哨和听音哨，也是一个世界上做各种合法和非法的买卖的地方。当地的报刊说，在维也纳的各国主要是东西方的情报人员有十万之众。

这个说法未免有夸大之嫌，但长住的，短期的，临时来往的，也不一定相差很大，比二战时某条战线双方结集的兵力也不逊色。一些欧美作家的间谍小说取材于维也纳的不少。

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不少国际组织的办事机构，除了迁来不久的联合国机构外，最重要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秘书处，只要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发生大起大落，这个组织的石油部长们就到这里来开会，决定价格多少，生产多少，到时大石油公司的经理们和记者们便云集这里，打听会议讨论的情况。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有一万多次，少至几十人，多至几千人。当然，很多人是“公费旅游”的，但也有许多人是研究学术，交流经验的，还有些是听听行情，看看市面的，或者找个机会做些买卖的。不论是在会议上还是在招待会、宴会上，都有机会见到各种各样的人，有专家教授，学者名流，有经理总工程师，有做各种各样贸易的，甚至做武器交易和禁运物资的，还有做情报生意的，真是鱼龙混杂，应有尽有。

每当华灯初上，也说不清有多少个招待会和宴会，有时一个晚上还要赶两场到三场。

而且，维也纳毕竟是音乐之乡、文化名城，还有邀请看歌剧，听音乐会的。多瑙河畔和维也纳森林脚下的宾馆、酒店里，常常是高朋满座，座无虚席，即使碰到经济不景气，开支要削减的时候，也并不减色多少。只要国际上有些风吹草动，这种邀宴请，听音乐，看歌剧之类，更是热闹到了极点，互相摸底试探，做交易订“君子协定”，再向记者透露些什么，制造出一个个疑团来。在这些场合，还会碰到许多陌生的脸孔，有达官贵人、名流要人、名媛淑女，有各种各样国籍的人或者×籍×人，听他们谈看法，说笑话，不管是真是假，姑且听之也是很有趣的。

到维也纳以来，我越来越感到这里是一个国际上重要的观察哨和听音哨，因而受到了许多国家的重视。当然，我国不参加东西方的明争暗斗，也不同别人做什么交易，但同别的国家一样，注意观察和听音，对了解和研究东西方关系和国际气候都是有好处的。

我做外交工作时间不长，对裁军之类的问题也不熟悉，应很好安排我自己和使馆外交官的工作和学习，有计划有目的地参加对外活动，提高政治敏感和分析判断能力，把调研工作做得更好。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午参加了荷兰大使作东的说德语大使俱乐部午餐会，奥外交部长帕尔作为客人出席。这个俱乐部是荷兰大使两年以前发起的，成员有十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大使，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南斯拉夫大使和我。成员的条件是能说德语，每两个月轮流作东在使馆内举行午餐会，每次邀请一位奥方政界、经济界的领导人作为客人出席。会上主要是奥方客人回答大使们提出的问题，大使们也可简短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种午餐会对了解奥方对一些重大的国际国内问题的看法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大使们也可利用这个会晤的机会谈谈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在维也纳，有不少这样的各级外交官的自愿的组织，如登山、桥牌、打猎等，也邀请奥方相应的客人参加。我只参加了由智利大使发起的大使登山俱乐部，其他的我不懂也没有兴趣参加。过去，部内对这些自愿组织规定很严，因而很少参加，后来感到这对联络感情和了解情况有些好处，就逐渐有选择地参加了。

帕尔外长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很谨慎认真的职业外交官，已担任这个工作多年。这是因为社会党已连续三次单独执政，克赖斯基总理富有外交经验，也重视外交工作，所以他没有在自己党内，而是在职业外交官中选择了政府的外长。如果是联合政府，一般则由另一个党的人担任副总理兼外长的。帕尔刚刚访问中东后回国，是为克赖斯基总理明年出访中东国家作安排的。

因此，有的大使问到了奥政府同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看法有分歧的问题。克赖斯基总理在1979年7月以社会党国际副主席的名义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到维也纳就中东问题交换意见，社会党国际主席、联邦德国社会党主席勃兰特也参加了会谈。在1980年3月，克赖斯基总理又同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维也纳设立办事处。美国方面对此极为不满，因而两国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在美国驻奥大使奉调回国后，美政府一直没有任命新的大使。

帕尔说，我们十分重视同美国的关系，并且一直致力于增进这种关系。当然，这不会也不可能什么问题上都看法一致。克赖斯基总理已一再重申，中东问题不仅是巴勒斯坦、以色列的问题，而是世界和平和安全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关系的问题上，只有采取公平合理的做法，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我们同以色列的关系是好的，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我们对犹太人有错误，在战后我们已一再向以色列道歉。

但我们也不赞成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因为这无助于巴、以问题的解决。对这一点，我们已向美国和以色列都明确地说明过。又有大使问到美国有些人批评奥政府的中东政策是为了打开中东的市场。他笑笑说，当然，我也没有必要隐瞒发展贸易和经济合作是我们中东政策的一个因素。我想美国也是一样，如果他们的政策能做到公平合理，生意会做得更多。

他又说，奥地利是一个小国，也是一个永久中立国家，我们希望和平，为此我们愿意为东西方和其他对立各方提供商谈、会晤、谈判的场所，以便消除或者缓和它们彼此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实现世界和平，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和目的。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正当人们开始为圣诞节和元旦忙碌的时候，在维也纳爆出了大丑闻。

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安德罗希在执政的社会党全国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上，宣布辞去他的政府职务。

他还表示辞去他的全国理事会理事和联邦议会议员的职位。

这件丑闻早已是这两个月以来在维也纳的主要的话题，对人们并不感到意外，但来得如此之快，也不免有些吃惊。维也纳法院自今年以来在审理去年刚刚修成的维也纳综合医院的院长在修建过程中的贪污案件时，发现安德罗希的丈人所有的、他本人也是公司董事之一的税务顾问咨询公司接受了贿赂。不久，媒体揭发了这一丑闻，反对党也在议会里提出了质询。自安德罗希在 1979 年 5 月大选后担任现在的这个职务以来，反对党的议员和报刊一再攻击他作为财长同时又是他丈人公司的董事是不相称的，执政的社会党全国理事会也要求他辞去公司的职务。他对社会党领导层和媒体一再解释他在公司只是挂名的，从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为公司做什么事，但他始终没有辞去公司的职位。

大约一个月前，媒体又揭露了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得到了一笔利息低廉的贷款在维也纳郊区修建了一所住宅。这个消息犹如火上加油，反对党和媒体纷纷要求他辞职。同时，法院也传讯他的丈人和公司的高级职员，了解接受贿赂的问题。这家公司在 1970 年成立时只有职员 16 人，到 1979 年已增加到了 91 人。后来，联邦议会成立了包括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小组，调查这个公司的情况和他在公司中的作用。原先人们估计，他有可能过得了关，因为没有调查出更多的材料，而且取得低廉贷款修住宅的也大有有人在，即使不成，也会在圣诞节和元旦假期以后等事情冷却一些时，再让他体面地下台。

安德罗希在维也纳政界中，一直被认为是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他只有四十多岁，在内阁中是最年轻的，而且过去曾担任银行、商业、政府、议会的各级领导职务，一直被认为是理财的能手，在政坛上一路发展顺利。而且，克赖斯基总理年已老迈，体力衰弱，在上次大选后破例提拔他为仅次于自己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可能是有培养他为接班人的意思。因此，安德罗希的垮台，是对社会党尤其是对克赖斯基总理的一个很大打击，影响将会是很深远的。

安德罗希是我到维也纳后认识的第一个奥政府的领导人。我到维也纳后第二天，住在我们对门的联邦德国大使就来电邀请我参加当晚为安德罗希举行的晚宴。我在联邦德国工作时，他是联邦德国外交部的礼宾司长，而且曾陪同联邦德国总理和外交部长两次访问过我国，是我的老朋友之一。我对安德罗希完全不了解，只是在参加宴会前匆匆问了使馆的同志。我在宴会上没有机会同他多谈，初步的印象完全是一个年少气盛但缺乏深沉政治经验的政客。一方面显得很有才干，精练，对自己很有信心；另一方面也露出很多的骄傲自负，谈话动作都有些做作，令人感到他的根底不深。在他辞职的当天，在社会党的影响下，奥地利最大的银行信贷银行选他为银行董事，并且从明年 7 月 1 日起为总经理。人们估计，如果他不接受教训，这个差使仍是干不下去的。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晚上参加了基希施莱格总统为外交使团举行的新年招待会。这是总统一年一度接见各国外交使节的活动，是很隆重的。奥外交部通知，大使或代办的汽车上要挂国旗。奥方规定除了每年总统招待会、国庆招待会和议长招待会外，日常活动汽车上可不必挂国旗，不像很多欧洲国家那样所有公务活

动都要挂国旗。在这次招待会以后，维也纳政界、经济界、外交界都要开始过圣诞节和元旦假期了，到明年一月中才结束。

总统招待会传统地在故宫的最老的一部分“瑞士大院”的“大使大厅”中举行。大使或代办到达这座全部用白色大理石修建的宫殿后，先在前厅里按照呈递国书的先后排成长长的一列，大使在前，代办在后。不久，总统在总理和外长的陪同下走出来，同大家一一握手，祝贺圣诞和元旦佳节。然后，人们就走进光彩夺目的“大使大厅”参加音乐会。这个气派很大的大厅全部用白色带有黑纹的大理石修成，中央四个大圆柱之间垂下八盏大水晶吊灯，照得大厅光芒四射。在圆柱之间一端的白色大理石台阶上，穿着黑色燕尾服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室内乐团的乐师们都已端正地坐着。在另一端的听众席上，总统、总理、外长和外交使团团团长坐在前面，大使和代办们坐在后面。音乐会开始时，全体起立，乐团奏奥地利国歌。然后，乐团演奏了莫扎特、贝多芬、海顿、舒伯特的名曲，最后以奥地利的“第二国歌”《蓝色的多瑙河》结束。美妙的乐声，明亮的大厅，再加上肃静的气氛，不由得令人感到音乐之乡的一往情深。

这个“瑞士大院”是统治了奥地利 640 年的哈布斯堡王朝(1278—1918)，在建立统治后在多瑙河上修筑的一个屯兵的城堡。当时，国王住在离维也纳 20 多公里的克劳斯特皇宫里。到 15 世纪末，腓特烈皇帝把这个称为“瑞士大院”的城堡改建为皇家的教堂，其中的合唱大厅非常美观，后来又成立了第一个皇家乐队和合唱团。到 16 世纪中，斐迪南第三皇帝在这个教堂后面修建了宫殿，才搬迁到了维也纳。随着帝国不断扩大和强盛，教堂的右侧改建为珍宝馆，左侧的合唱大厅改成为“大使大厅”，作为皇帝会见外交使节和为外交使团举行宴会和音乐会的地方。至今，奥国家领导人每年在这里为外交使节举行招待会。音乐会结束后，总统又为外交使节举行了冷餐招待会。

12 月上半月对外交界是最忙碌的。政界、企业界等要举行招待会或宴会，有些单位还要邀请看歌剧，听音乐会。一些大使要离任，举行告别招待会，更多的大使将回国或到外国去休假，为还别人的人情而挤时间举行宴会，因而几乎每天都有两场到三场活动。

但在这些招待会和宴会上，会认识许多的人，交更多的朋友，对我开展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欧洲人不太习惯用名片，而且还嘲笑日本人拿了一大堆名片散发。所以，在会上碰到一些重要人物还要用心记住他们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回到使馆甚至在汽车上赶快记下来，以便今后保持联系。还有在这些会上听到的一些我觉得有意思的话，也要同样地记下来，作为调查研究的材料。常常会一下子忘记了，怎么也想不起来，在这个时候真是感到做外交工作的不易。

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

上午终于在金色大厅里直接欣赏了闻名全球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这是要感谢维也纳市政府赠送给每个驻奥地利大使及夫人的全年免费音乐会票，凭票可以参加包括新年音乐会在内的所有在维也纳演出的音乐会。我到欧洲工作以后，每年元旦上午都在电视上欣赏这个令人难忘的音乐会，而且时常想起如果有机会亲自在金色大厅里感受音乐会的热烈气氛，那会多么令人陶醉呀。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新年音乐会在上午 10 时开始。我和夫人差不多在一个小时之前就到了市中心的音乐大厅，前厅里已挤满了热情的听众，多数人像参加盛会一样穿

着黑色的夜礼服。很多是国外来的听众，都是乘汽车、火车或飞机早几天甚至早几小时赶来的。音乐大厅有两个演奏厅，一个是金色大厅，另一个是小演奏厅，主要是室内乐团演奏的。音乐大厅是奥地利历史很久的音乐爱好者的组织——音乐之友协会从 1867—1869 年花了两年时间修成的，其中的金色大厅在 1870 年 1 月 6 日举行了首场演出。音乐大厅同所有歌剧院和音乐厅一样在开演后不再允许入场，听众在入场铃响过后就全部就座了。

金色大厅在巨大的金色的水晶吊灯的照耀下，金碧辉煌，灿烂夺目。乐台背后排放着黄铜制的风琴乐管，金色镂花的巨大壁龛上装饰着彩色缤纷的鲜花，前沿摆设着一盆盆热带花草。乐台上面和二楼包厢的金色栏杆下面也吊挂着许多的花篮，场内清香四溢，生机勃勃。音乐会共两小时，中间休息一次，过去电视现场直播只播后面一个小时，当时主要是欧洲地区的 20 多个国家的 7 亿多人可以收看，美国、苏欧、中国和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不能直接收看。

音乐会开始后，圆舞曲优美轻快的旋律立刻扣紧了听众的心弦，把大家带到了神秘梦幻的境界中去。我们好像随着飘荡的乐声飞出了大厅，在辽阔的大地上翱翔漫游，一会儿听到了蓝色多瑙河的低吟浅唱，苍翠的维也纳森林的热情呼唤，一会儿看到了南方的玫瑰开遍原野，葡萄架上挂满绿色和红色的果实，恋人们在淡淡的月光下坐在磨坊旁边谈情说爱。感谢音乐家们把大地上下和人们心灵中美好的一切都变成了令人陶醉和难忘的旋律。现场这种梦境般的漫游和升华，在电视屏幕上是不可能感受到的。因此人们只要有都会到这个音乐之乡来参加这个盛会。

维也纳音乐界都认为，新年音乐会的历史应追溯到 1873 年 11 月 4 日维也纳博览会当局为欢迎第一次参加博览会的中国代表团而举行的音乐会（清同治十二年）。这次音乐会由有名的皇家歌剧乐团在金色大厅中举行，并按照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演奏了施特劳斯父子的圆舞曲。当时，圆舞曲虽然风行一时，但人们认为这不过是舞会和节日的乐曲，没有举行音乐会的价值。由于这种偏见，皇家歌剧乐团没有演奏过圆舞曲，金色大厅中更没有举行过圆舞曲音乐会。所以，这次圆舞曲音乐会是破天荒第一次，直到 1925 年在施特劳斯过世 26 年以后，维也纳爱乐乐团为纪念他百年诞辰，才举行了施特劳斯父子的圆舞曲音乐会。从 1941 年起，每年元旦上午举行圆舞曲音乐会，但到 1946 年才正式称为新年音乐会。从 1956 年起，这个音乐会通过欧洲电视网传到欧洲各地。这些年来，又通过卫星向全世界播送，从而成为全球一年一度的盛会。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

圣诞节和元旦假期已基本上结束，奥总统和总理都回到维也纳开始办公了。我们使馆及各个处都利用这个时间对形势和工作做了总结，报回国内各部门了。我到维也纳已近半年，对各方面的情况已大体上熟悉，也利用这个机会作了一些回顾，争取今后比较有计划和有目的地做好工作。

当然，使馆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我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奥地利也希望发展经贸关系，两国政治关系很好，所以更应把经济关系作为重点。奥地利是一个小国，又是一个发达国家，但奥经济有什么长处，在哪些方面可以进行合作，我们并不很清楚。听说多瑙河上的低水位水坝对我国西部山区很有用处，奥山区环保特别是林业，我国也很有兴趣。因此，应同使馆商务处一起对奥经济情况进行深入的调研，

做到心中有数。

对维也纳联合国机构特别是两个大的组织要做好工作。工业发展组织同使馆工发处关系很好，合作也有成效，例如做工业发展模型，中小企业管理技术咨询，培训管理科技人员等。但发展组织经费有限，同我国合作主要是在计划、咨询、培训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我国还没有参加，但机构总干事已拜访过我国驻联合国纽约总部的代表和副代表，希望我国能够参加，听说我国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对原子能问题完全是外行，要很好了解有关的情况，可能国内会来询问。

维也纳是东西方的桥梁和情报中心。不少东西方的谈判、会谈、接触等都在这里进行，很多国际会议也在这里举行。有大量进行东西方贸易的商行公司，还有不少苏联东欧的流亡人士从事各种职业。我国不参加东西方的活动，对他们的情报斗争也没有兴趣，但我们也可利用这个地方了解东西方的矛盾和斗争，对国内研究东西方关系是有用的，而且苏联东欧对我国使馆一直限制很严，维也纳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哨，也要了解一些苏欧的情况提供国内参考。我过去在第三世界和西欧工作，对苏欧的情况很不熟悉，能否做好还要努力学习。

这里还有不少国际组织的办事处、秘书处、代表处等，有的已同我国建立关系和联系，有的还没有。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秘书处，当然是我最为关心的，随着我国石油生产的不断增加，听说石油国家正在研究邀请我国作为观察员参加他们的年会，迹象之一是多数石油国家虽然同我国没有外交关系，但已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国庆招待会以及其他一些大型的招待会。此外，国际专利协会在维也纳设有欧洲办事处，因为奥专利局历史长，经验多。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正在组建专利局，今后肯定会同这些机构建立关系的。国际审计署长协会的秘书处也设在维也纳，我国财政部的同志已托人来问这个秘书处有关的情况了。现在还弄不清还有什么国际组织，以后要找奥地利朋友详细了解一下情况才行。我对使馆的同志说，我们不熟悉的事情还很多，工作并不轻松，要努力调研和学习，才能应付工作的需要。

五

一九八一年二月五日

早上，看到美国报纸的一条消息透露说，苏联克格勃收买了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的清洁女工，收集总部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扔掉在废纸桶里的碎纸片，企图在这些废纸里搜寻北约的机密。克格勃的活动真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

我立刻要研究室的同志告知使馆各个处的同志看看这个消息，并且把这条消息译成中文写在黑板报上，提高大家保密的观念。

使馆食堂里有两块黑板报，一块写当天外交官的对外活动的日程，另一块写当天奥地利和其他西方报刊上已译成中文的重大消息。

其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一样。在我到维也纳之前，苏联报纸也透露，中央情报局买通了在苏军驻东欧某基地工作的当地工人，要他们报告基地里

装运武器弹药的木箱增减的情况，以了解苏军的调动变化。这也真是费尽了心机。

后来，我也要研究室的同志译成中文登在黑板报上。这种具体的例子对提高同志们的警惕性，比我口头上讲要好得多。

我每天早上在 7：30 吃过早餐后就开始看报，除了奥地利和西德的报刊外，还看一些美国和法国的报刊，直到 9：30 才开始对外活动。

当我看到一些重要的消息时，常请研究室和其他有关的处的同志们一起来讨论，并要他们注意跟踪研究。这两个小时的看报对我和同志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一再告知使馆办公室负责礼宾的同志，除非实在迫不得已，一般不安排对外约会，因为不注意看报，就不可能知道驻在国和本地区的大事，在对外活动中必然抓不住重点，甚至不懂装懂，闹出笑话来。不懂外文的同志可以看黑板报，当然也要努力学习外文，尽快达到能够看报的水平。当然，两个小时还是不够的，一些长的消息评论要等晚上抽空来看。

保密问题始终是我们使馆要不断提醒和检查的经常性大事，尤其是窃密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更应提高警惕。

几个月前，研究室的同志在一家西欧报纸不太显著的位置看到一条消息说，中央情报局已经破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 7 个国家驻西欧某国的使馆的外交密码。这个消息有些含糊不清，也有可能是“神经战”，但我们只能信其有而不能信其无，不能失之大意。

窃密和反窃密的斗争在外交上一直是很严重的，在我们不少使馆和驻外机构里不断发现了窃听器和窃照器，而且技术上越来越先进。我过去在新华社驻国外分社工作，有一次在分社的房子里发现了 11 个窃听器，其中有一个在洗手间里。所以，要不厌其烦地提醒同志们文件和记录本要保管好，重要的会议、传达、谈话必须在保密室里进行，草稿、废纸等必须随时销毁，等等。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必须以身作则，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做好使馆的保密保卫工作。我常常对同志们说，千万不要以为外交工作很轻松，被参加宴会和招待会、同别人干杯弄糊涂了，而要整天身上担着一个挑子，一点也不能松懈，否则就要犯错误。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五日

北约和华约之间的中欧裁军谈判在圣诞节和元旦休假后复会，开始了第八年的旷日持久的谈判。在早上 11 时之前，挂着胸牌的北约和华约的大使们以及他们的 110 个外交官，都准时走进了奥帝国故宫中由背着冲锋枪的士兵守卫的雷杜德大厅。在 11 时第二次开会铃响过后，大厅工作人员从大门上摘下了写着“大厅已开放”的牌子，轻轻地把大门锁上了。

双方的大使们走进楼上的会议厅，坐在一张巨大的圆形的桌子周围，外交官们分别坐在他们大使的后面。这个会议厅原来是奥帝国时期举行舞会和音乐会用的，在维也纳堪称是最富丽堂皇的了。在八盏巨大的水晶吊灯的照耀下，大厅内涂金和彩绘的画顶、雕柱、墙壁都在闪闪发光，挂在四周墙壁上的出自上世纪名家手笔的油画也更光彩夺目。

但是，绝大多数的会谈参加者这些年来到这里不知多少次，对这些已是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了，只有新来乍到的人看到这样豪华的大厅不断发出赞叹。

这个没完没了的谈判早已引不起新闻媒介的兴趣，但今天却来了不少的记者，给大使们又拍电视又拍照。原因是，美国已更换了政府。共和党的

里根在去年 11 月的总统选举中打败了原来的民主党总统卡特，并且在今年 1 月 10 日上了台。所以，记者们想来看看在这个旷日持久的谈判中，美方会有什么新的举措，而苏方又有什么新的姿态。在谈判之前，苏方已急不可待地想试探美方的态度，放出空气说，可以先不谈把谈判引入死胡同的双方在中欧的兵力数字，而来谈双方可以裁减的兵力数字。原来，这个谈判已进行了 7 年多，却只谈了一个问题，即双方在中欧的兵力数字。华约方面说有 81.5 万人，北约方面不相信，认为应是 96 万人，华约故意隐瞒了 15 万人。双方闹得不可开交，谁也不肯让步，而且造成会议一再中断。

在复会之前，西欧国家的大使们曾对我说，他们不相信会议会有松动，更谈不上会有突破。他们认为，美苏关系仍很紧张，难以有所让步。1979 年底苏军入侵阿富汗，美国公开支持阿富汗抵抗力量，并且在 1980 年夏同许多国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波兰经济严重困难，内部不稳，政府与工人的矛盾激化，党和政府都已更换领导，苏联极为不安，美国已警告苏联不要干涉波兰。当然，双方都不想谈判破裂，因为美苏在日内瓦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三阶段还未开始，只有维也纳的中欧裁军谈判仍在进行，双方都不愿意放弃这个重要的渠道，所以谈判仍会拖下去，但不会有奇迹。

事情果然如此，谈判只进行了一个小时，会后举行了例行的记者招待会，加拿大大使代表西方指责对方缺乏诚意与和解精神，而波兰大使代表东方也抨击西方仍采取不现实和不合作的态度。记者们当然对谈判没有抱多大希望，但也不免有些扫兴，只提了几个问题就冷场了。会议散场，一个星期后再开，但 4 月中旬的复活节假日已临近，这一个回合的时间又没有多少了。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春节刚过不久，国内有二三十个公安、边防、海关人员到维也纳来接受麻醉品管制署的短期培训。我才知道，他们中有不少人还没有见过毒品，有些人见过，也识别不了毒品，绝大多数更不清楚如何检验毒品。培训是由联合国纽约总部安排和资助的，以后还有几批人员要来接受培训。听培训的同志说，缅甸、老挝、泰国三国的金三角地区生产的毒品除了仍经由东南亚和香港偷运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外，已经发现经由我国西南边境偷运到香港再转往美国和其他国家，甚至经由我国南方城市直接偷运到那里去。我国公安、海关、边防人员已经缉获了很多偷运的毒品，而且数量也在增加。在我国大陆上自解放以来毒品早已绝迹，很多公安、边防、海关人员缺乏识别和检验毒品的知识，因此给了毒贩可乘之机。而且，我国边境地区也受到影响，已发现有不少人吸毒，还在向内地蔓延。为此，我国有关部门决定派出一些人员到维也纳来学习。

我们的同志对我说，毒品问题正在变得严重起来，他们将很好参加培训。根据麻醉品管制署安排的培训计划，他们首先是看世界各地拍摄的影片和电视片，从毒品对人类和社会的严重危害到毒品的种植、生产、偷运、洗钱等。然后是如何识别和检验海洛因、大麻、鸦片、吗啡、可卡因等毒品以及仍可用作毒品的医疗用的针剂和片剂。最后是介绍国际毒贩用越来越隐蔽的办法偷运毒品的活动。培训大约半个多月，结束时管制署将赠送每个人一只装有检查中可以快速检验毒品的设备的小箱子。同志们准备学完后立即回国去，连维也纳这个有名的城市也不想参观，以便早日回到工作岗位，并且让下一批同志到这里来接受培训。

这两个月来，管制署的代表已几次向我通报了有关金三角的毒品经由

我国境内偷运到其他国家的情报，并且说联合国纽约总部已把这些情报送交北京公安部门，但为了引起注意，认为仍有必要向我通报。我对这几年来毒品泛滥如此之快，感到十分吃惊和担忧。我这次到任以后，同我的前任一样，只是对管制署的代表作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没有什么工作上的接触，因为毒品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已很泛滥，但在我国大陆上已绝迹很久，也没有经由我国境内转运到其他地区的事，很多年轻的人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毒品。可是，为时不久，我同这个机构的关系就多了起来了。禁毒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国内已引起密切关注，我今后应用更多的力量把这个工作做好。

仅仅两年以前，我曾随一个代表团在曼谷参加了国际会议后，访问了泰国西北同缅甸、老挝接界的金三角地区。我在泰国一侧的一个小镇的宾馆阳台上，观看湄公河从缅、老边界中流过来，又向泰、老边界流过去，左边是老挝，右边是缅甸。这三国的边界上都是茂密的碧绿的森林，人烟稀少，看不到种植罂粟的土地。泰国朋友说，这里看不到，都在内地，这些年来每当罂粟成熟的季节，泰国派飞机去投弹焚烧，罂粟地就移向更深的内地，而且分散成更小的小块，连飞机也很难找到。这个地区的毒品生产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同时，这个地区吸毒人数也在增加，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如不采取更坚决的措施，将会越来越难以收拾，已到了采取坚决的措施的时候了。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

中午，我请流亡在维也纳的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姆利纳日在使馆吃便饭。他很快将同流亡在瑞士的捷克人一起到中国访问。他们曾在杜布切克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时期在党和政府内在财政、贸易、金融、法律等方面担任过各级领导职务，后来在苏联 1968 年 8 月 20 日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逃亡到瑞士和奥地利。他们对计划经济的问题有较深的认识，并且也有实行经济改革的初步经验。因此，国内有关研究所和大学邀请他们去交换意见和进行讨论，作为我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参考。

姆利纳日在 1967 年担任捷共中央书记处负责青年工作的书记，当时他只有 30 多岁，是中央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个。他曾在莫斯科大学读法律系，同已在苏共中央工作的戈尔巴乔夫是同班同学，而且多年住学生宿舍同一寝室。在 1968 年 1 月初，杜布切克接替诺伏提尼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他是在国内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政治经济困难加深和苏联肆意干涉内政严重不满，造成社会动荡，党内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上台的，采取了经济改革的政策，并且改变了对苏联亦步亦趋的做法，因而受到了群众和干部的欢迎，因此这个时期被称为“布拉格之春”。姆利纳日积极支持了这个政策。可是，这引起了苏联越来越大的不安，在多次施加压力无效后，就悍然采取了军事入侵的行动。杜布切克被解除了职务，最后又被开除出党。姆利纳日逃亡到维也纳后，写了一本书《布拉格之冬》，记述了这个时期的经验教训。

他送给我这本书后说，“布拉格之春”很快失败了，但留下来的经验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当时的领导，开始时是对苏联的军事干涉估计不足，盲目乐观，后来在苏联威胁增加的情况下，又惊慌失措，软弱无力。那时，我们的党和政府曾向友好国家呼吁，希望给予支持和援助，可惜当时中国方面没有反应。但看到中国报刊却说这是老修正主义反对小修正主义，我们感到很失望，当然，那时中国正处在“文革”高潮时期，我们也可以理解。“布拉格之春”是一场我们人民反对苏联控制和干涉，要求独立和自主的运动，

不会因这次失败而告终，而是相反，将来一定会更加猛烈地爆发出来。

姆利纳日到维也纳后一直在一家经济研究所工作。他说，他主要研究捷克计划经济及国营企业的问题，也考察奥地利国营企业的问题。当然，这两种经济不是一回事，但有参考的价值。在战后，奥地利是一个小国，当时又是被战胜国占领的国家，私人资本有限，因此建立了不少国营企业，效果都不错，对我们有参考意义。他又说，他还有些问题不太清楚，这次能有机会与中国的学者交换意见是非常高兴的。像我们这样的国家，确实有许多的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有待大家来讨论和研究。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

维也纳市长格拉兹按惯例为驻奥地利的大使和代办举行冷餐招待会，但今年不同的是先招待观看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演出的歌剧《阿伊达》，而在演出中间休息时招待冷餐，这受到了外交使节们的欢迎。《阿伊达》是意大利大歌剧家威尔第在 1871 年为纪念苏伊士运河通航而谱写的以古代埃及为背景的著名歌剧，在开罗首演时盛况空前，一百多年来始终是受到观众欢迎的节目。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在圣诞节和元旦休假后再度推出了这部规模宏大的歌剧。著名指挥家马采尔是搞大场面、大阵容的高手，不惜重金排出了十分强大的阵容，特别是聘请了世界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担任主角，并且重新制作了布景和设计了戏装。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维也纳市长格拉兹考虑到今年初新任的大使很多，因而改变在市政府举行冷餐招待会的计划，先请大家一睹这部大受欢迎的歌剧。在冷餐时，市长邀请一些大国的使节与他同桌进餐，很多大使都热烈地赞扬演出的成功。

国家歌剧院是欧洲最古老的歌剧院之一，从 1857 年起修建，断断续续修了 12 年，到 1869 年才修成。歌剧早在 17 世纪初从意大利传入维也纳，但在很长时期内只停留在模仿上，到 18 世纪下半期相继出现了莫扎特、海顿、贝多芬等音乐家，特别是莫扎特的歌剧上演后，在维也纳才有了自己特色的“莫扎特风格”的歌剧，从而成为欧洲歌剧的中心之一。因此，奥帝国法朗茨·约瑟夫皇帝在 1857 年下令修建新的国家歌剧院，委托两位著名的建筑师努尔和西卡斯伯格负责这个工程。可是奥地利在 1866 年在同普鲁士的战争中打了败仗，经济上发生了严重的困难，这个花费了大量财力物力的工程受到了社会上激烈的批评和责难。努尔非常伤心沮丧，在 1868 年 4 月自杀，西卡斯伯格已患重病，听到好友的不幸遭遇也在两个月后去世。

国家歌剧院高大的方形的建筑雄踞在老城的环形大道上，是仿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剧院的式样，全部用意大利浅黄色大理石修建的，显出庄严而又华丽的气派。剧院正面高大的精工雕刻的门楼有五个拱形的大门，楼上有五个拱形的窗户，窗中站立着五个青铜女神雕像，门楼里是著名的《魔笛》画廊，莫扎特的最后一部歌剧《魔笛》在 1791 年在维也纳首演时连演 200 多场，因而在歌剧院建成时请有名的画家在门楼画栋雕梁之间的墙壁上全部画上了这部歌剧的精彩场面。走进大门，白色大理石的门厅在六盏水晶吊灯的照耀下显得格外辉煌灿烂。门厅正中白色大理石的楼梯分成两翼引向二楼的演出大厅和楼厅，在楼梯的转角上和两翼走廊的栏杆上站立着金色的女神雕像。演出大厅内更是金碧辉煌，房顶上是金色的花纹图案，周围贴着红色呢绒的墙壁上镶嵌着金色的花纹，三层 100 多个包厢上也装饰着金色的花纹，正厅和包厢里一共有 1642 个铺着红色呢绒的座位。可惜的是，歌剧

院在 1945 年 3 月希特勒投降的前夜，在一次大轰炸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剧场和舞台大部被炸毁，只有门楼和门厅损失较轻。战后，奥政府用了多年时间到 1955 年才修复。

国家歌剧院所属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是世界上历史最久和影响最大的交响乐团之一。

这个乐团最老的前身是皇家歌剧乐团，在 1498 年成立，当时规模很小，只是为演出歌剧演奏，不单独举行音乐会。后来，随着古典音乐的发展，社会上和乐团内都有了举行音乐会的要求，乐团终于在 1842 年 3 月 28 日中午在皇宫大厅内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名义举行了第一次音乐会。以后，乐团把这个日子作为自己诞生的时间。乐团的团长通常是由歌剧院院长兼任的，著名音乐家马勒、卡拉扬等都担任过。

六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上午十多个曾在上海避难过多年的奥地利犹太人一起来看望我。他们在 1938 年希特勒入侵奥地利前后逃到了上海，直到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才回到了奥地利。他们在上海住了 10 年左右，都能说一些上海话，对中国人特别是上海人非常亲热，说永远忘不了上海的救命大恩。我是在上海长大上学的，因而他们也把我看成是自己人。我本来是想请他们中午来吃便饭的，但他们说我刚到任，事情很多，只要吃一些上海小点心就可以了。使馆厨师中没有上海人，只有一个常熟人，做了一些上海人常吃的油条、豆浆、馄饨，还做了上海大世界旁边店铺里卖的菜饭。他们看到油条、豆浆很高兴，但过去到使馆来要过，使他们吃惊的却是菜饭，他们笑着用上海话说，我要排骨的，你要四喜的。

大家像老朋友一样，谈得很高兴，吃得也很高兴。他们在上海的时候正好我也在上海，谈的都是过去上海的往事，用的是德语和上海话的“合资德语”，到中午才尽欢而散。

他们中领头的一个中国名字叫洪贻生，他是我去年到维也纳后最早认识的上海犹太人。在使馆国庆招待会上，一位头发花白，戴着老花眼镜的矮个儿客人走进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用上海话对我说：“我是上海人，叫洪贻生，你就叫我老洪好了。我是 1947 年回到奥国的，上海话都忘记脱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德文名字叫亨格勒特，原来是维也纳一家银行的职员，在 1938 年希特勒侵占奥地利之前几个月逃到了上海。他父亲早两三年到上海开了一家卖零头布料的小店，他到上海后给英国人看大门，还在父亲店里做活，日子还混得下去。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把所有犹太人集中在虹口一个地区里。不久，他父亲病故了。他和夫人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才恢复了自由，就申请回奥地利的护照，终于在 1947 年回到了维也纳。他几次对我说：“我侬一家永远不忘上海的救命大恩，否则早在德国集中营的炉子里烧掉了。”过了几个月，他来了电话，他要带十多个在奥地利的曾在上海避难过的犹太人来看望我。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的犹太人大多数去了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地方，只有很少年龄大一些的人回到了奥地利和德国。当时在奥地利的大约有 100 多人，很多由于年龄大，找工作很困难，不少人靠政府救济为生。他们对中国人特别是上海人怀有真挚的感情。在 1965 年初我国在维也纳刚设立商务代表处时，他们就找上门了，后来在 1971 年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他们更把使馆看成自己的家。那时，他们人数还有六七十人，还有三个上海媳妇，原来都是纱厂的包身工人。后来，有些人病故，有的人离开了，到我 80 年代初到维也纳时只有十多人了。

战后，有许多犹太人从美国和其他地方回到了维也纳。后来，又有不少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到维也纳来建立公司企业，同苏联东欧做生意。所以，在维也纳的犹太人逐渐多了起来。经过美苏之间的多次谈判，苏联对境内的犹太人放宽了移居国外的手续，大多数都经过维也纳再转到以色列、美国和其他地方去。在维也纳郊区，有两个犹太人的难民营，苏联犹太人来到后先在这里居住，经过甄别后再转出去。在维也纳市内，有犹太人的教堂、商店和学校等。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晚上，奥国民议会反对党人民党的副议长邀请我参加在维也纳著名的萨赫饭店举行的晚宴。副议长是人民党的元老，曾两次访问过中国，与苏联东欧也有不少交往。参加宴会的有人民党的主席莫克和其他主要的领导人，奥地利的大主教柯尼希，以及同我一样到任不久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大使。

副议长在宴会上把我作为主宾，坐在他的右面，莫克坐在他的左面。柯尼希坐在他对面，两边是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大使按到任先后分别坐在他右面和左面。在外交宴会上，排位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要按客人的地位职务，到任先后，也要按主人举行宴会的意图，主要客人的排列等。这是一门非常细致的艺术，搞不好就会造成不愉快，甚至得罪人。我常常以一些正反实例，要使馆办公室主管礼宾的同志认真注意宴会排位的问题，而且在参加人家的宴会时，也注意通过排位来观察主人的一些想法。

在宴会上，主人给我热忱地介绍了莫克及其他人民党领导人。我到任后曾礼节性地拜访过莫克，简短地作了友好的交谈。莫克是在 1979 年 8 月担任人民党主席的，其他领导人中也有不少是新人。看来，这次宴会主要是莫克希望他的党加强同我国的关系。他在宴会上对我一再表示，他作为人民党新的领导的代表希望增加同中国的往来和联系。我说，中奥两国关系很好，我们同奥各个党都有来往，欢迎他加强联系和往来的想法。他还谈到发展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想法，我表示欢迎，今后如果有具体的建议希望随时告诉我。人民党在议会中是主要的反对党，在工商界中有很大影响，我今后除了做好执政党的工作外，也要注意做好反对党的工作。

主人还给我介绍了奥天主教大主教柯尼希，说他在上次访华时得到了深刻的印象。

柯尼希曾在 1980 年上半年应我国宗教界的邀请访问过我国，在他之后法国天主教的大主教也访问了我国，因而引起了国际媒体对我国同梵蒂冈关系的议论。但梵蒂冈同台湾仍保持着关系，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我到任后没有去看望柯尼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议论。副议长同梵蒂冈来往很多，他曾多次同我两位前任谈过愿意推动梵蒂冈同我国的关系。这次他专门宴请

我，并且邀请柯尼希参加，看来也有这个意思。我没有得到部内的指示，因此当他同我谈到同梵蒂冈的关系时，我只是简短地说明了我国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立场。

宴会 是外交工作，同样也是所有外事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有些是要增进友好关系，介绍认识一些朋友，也有些是要谈一些问题，了解一些情况，说明某个问题的立场等。我常常对使馆同志说，参加宴会是一个重要的而又细致的工作任务，出门前要有所准备，在宴会上要注意观察应付，回来后还要想一想有些什么印象。在“文革”中，有人把外交宴会说成是什么“吃喝外交”，即使不是故意诬蔑，也是愚蠢无知。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五日

我邀请波兰沙夫教授中午在使馆便餐。他是老共产党人，华沙大学哲学和经济学教授，由于在一些哲学问题上特别是异化问题上的争论，已辞去教授的职位。他非常赞成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认为波兰也应当这样做，虽然情况有所不同。他是一些欧洲名人在罗马成立的罗马俱乐部的常务理事，也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顾问，因此常到维也纳来，已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是第一次同他见面，听他从波兰局势谈到波苏关系，再到美苏关系，对我了解苏欧关系很有帮助。

他对波兰局势的恶化感到担心。去年 8 月革坦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为反对物价高涨、供应匮乏举行罢工，并成立独立工会。一些城市也相继发生罢工，有些城市的生活出现瘫痪。党和政府内部矛盾增加，发生分裂。8 月 24 日，平科夫斯基接替巴比乌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9 月 6 日，卡尼亚又接替盖莱克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但罢工仍继续扩大，工业生产不断下降。到今年 2 月 11 日，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再接替平科夫斯基成为部长会议主席。他是军人，但是温和派人物，能否控制局势，还很难说。这个危机没有结束，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他说，波兰由于它所处的地位和历史的情况，国内发生的问题不管是何起因，都会有反对苏联干涉和控制的性质，因而比其他东欧国家更易引起苏联疑虑和干预，而且也更会影响苏美的关系。勃列日涅夫已一再警告波领导人要注意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活动，已发现苏军在边境上有调动并举行演习。里根在 4 月 3 日写信给勃列日涅夫，警告他不要对波兰动武。可是，苏联不会容忍波兰局势的恶化，并进一步影响其他东欧国家。尤其是现在，听说勃列日涅夫身体不好，谁来接班尚在未定之中。柯西金已经病逝，苏斯洛夫也有病。苏联领导危机正在加深，今后的发展值得注意。雅鲁泽尔斯基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后，已召集政府、企业和工会的代表，希望各方作出让步，尽快达成妥协，停止罢工，恢复生产。他还明确警告各方如果继续闹下去，引起苏联的军事干涉，像 1968 年对捷克斯洛伐克所做的那样，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他还接见了在波兰有很大势力的天主教会的代表，希望他们能进行斡旋，稳定局势。这个道理比较容易讲通，但还有不少人不肯罢休，不能不令人担心。其他东欧国家的情况也不令人乐观，苏联长期来老子党老子国家的做法正在自食恶果。

我到维也纳后，一直感到在这里作为东西方的桥梁研究东欧局势及其同苏联的关系有方便之处。东欧国家对这里的工作很重视，除外交官外，还派有不少经贸、科技、文化方面的人员。同时，这里的东欧的流亡人员也不少。西方研究苏联东欧问题的人就更多。我在一些招待会上常碰到他们，如

果注意同他们谈谈，就有可能对某个国家的某个问题有个比较符合实际的了解。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在维也纳的中小银行里，可用西方货币以很低的汇率兑换苏联东欧的货币，而且数量不受限制。银行只是附上一张小条，说：“请您注意，这些国家的海关是不准带进它们的货币的。”苏联东欧原则上是不准带出本国的货币到国外的，那么这些货币是哪里来的呢？有人说，是苏联东欧的人自己带出来的，也有人说，苏联东欧外汇紧缺，有意投放一批本国货币在西方市场上的。可是，在维也纳和其他西方市场上苏联东欧货币的汇率，比苏联东欧本国官方的汇率低四五倍、七八倍，甚至十多倍。苏联卢布官价是一卢布换一个多美元，而在维也纳银行一个美元可换六七个卢布，东德马克官价是一个东马克等于一个西马克，但在维也纳和西柏林的银行一个西马克可换三个东马克，捷克斯洛伐克的克郎和匈牙利的福林也相差五六倍，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货币更相差十多倍。

苏联东欧的海关检查很严，也很难阻挡大量的货币带入境去。而且，苏联东欧的工资水平比较低，物价也相对比较便宜。因而，在西方市场上兑换苏联东欧货币，再带入境去在当地商店里买东西，住高级宾馆，进高级饭店，采购高档商品等，都难以想象的便宜。这样，就出现了许多的投机行为和违法分子。

同时，在维也纳有许多商店，专门为外国驻苏联东欧国家的使馆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领事馆采购食物、水果、用品和材料等，并且按时用卡车送到那里去。由于这些年来苏联东欧经济困难增加，市场供应缺乏，有些进口东西如香蕉、橘子、咖啡、可可之类减少进口，在市场上很难见到，有些食物和用品从肉类、鱼类、奶制品、酒类到洗衣粉、卫生纸等市场上有，但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也有很多商品买不到。因此，这些代购商店应运而生，成为生意兴隆的行业。这些商店服务周到，可以按月送，也可以临时急送，小到卫生纸大到电子设备都可买来送到，而且包退包换，但手续费运输费很贵。

我国驻苏联东欧的使馆为了节约费用，都自己开卡车来采购。开始时驻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的使馆来得多，后来驻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的使馆也来了，最后驻苏联使馆的也来了。他们挤住在我们使馆里，还要派翻译同他们一起采购，给使馆加重了工作压力，但兄弟使馆的困难比我们的困难更大，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是我们的重要工作。

通过这些情况，我深切地感到了苏联东欧的经济困难正在加深，今后应引起更多的注意。我过去长期担任新华社驻外记者，新华社总社有个规定，驻外记者应有三分之二时间在外面活动，不在办公室里，有些记者反映三分之二的时间太多，在外面无事可干。

后来，新华社总社的领导人说，如果实在没有事，可以去看商店的橱窗，看物价。就是说，到街上去，同普通人接触，看普通人的生活，可以观察和发现很多的问题。做外交工作也是一样，要注意细小的事情，普通的情况，有可能发现一些重大的问题。有不少的人觉得外交工作很神秘，其实同其他工作一样，都是从点点滴滴做起的。

七

一九八一年五月七日

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简称欧佩克）的石油部长在这里开会两天，分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和讨论石油的产量和价格问题。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有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加蓬、印尼、伊拉克、伊朗、卡塔尔、科威特、利比亚、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阿联酋等。这个组织的秘书处原来设在日内瓦，1965年迁到维也纳。石油部长会议一般每年两次，近几年来大都在维也纳举行，有时也在日内瓦举行，这次会议由于石油价格的猛涨，吸引了更多的大石油公司的代表和记者到这里来打听消息和影响会议的进程。

欧佩克是在1960年为了保护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利益而成立的。长期以来，这些国家出口的原油价格极低，每桶原油只有5美元，世界大石油公司赚取了超额的利润。这个组织逐渐提高了原油的价格，在1980年6月10日又决定提高到每桶32美元，造成了第二次石油危机。6月23日7个西方工业国家首脑在威尼斯开会，宣布要大力减少石油消费，增加煤炭生产和开发新的能源。奥政府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采取了紧急的措施，包括限制汽车时速，实行汽油配给，并且发起了每周一天不用汽车的运动。

奥政府对石油部长们以及会场采取了十分严密的保安措施。在1975年12月21日石油部长们正在维也纳总部开会时，有5名武装恐怖分子突然冲进了会场，劫持了11个石油部长，在冲突中有3人被打死，另3人受伤。经过谈判，第二天恐怖分子被奥航飞机送去阿尔及尔，石油部长们和其他人员被释放。以后，每次部长们开会，奥政府都派出了大量保安人员严密保护，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石油国家的代表们在会议上对石油的价格和产量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一些温和派的国家的代表认为当前的石油价格已经很高，如果再要提高，将进一步推动石油消费国家开发石油资源，建设核电站，加强节能措施等，对石油输出国家不利，另一些激进派国家主张每桶再提高到34或35美元。为了稳定石油的价格，大家都同意限制石油产量，但各国的限额多少，引起更大的分歧。因为所有国家的预算大都靠石油收入，如果减少出口就有可能造成财政困难，因此达成妥协难度很大。而且，各国之间的关系好坏更使会议的讨论变得复杂。两伊武装冲突正在扩大，两国在会议上争吵加剧。这个组织秘书处的秘书长本来是商定按各个国家的第一个英文字母轮流担任的，今年应该由伊拉克人担任，可是伊朗坚决反对，最后不得不由后面的一个利比亚派人代理。而要这两个国家接受石油产量的限额，就更为困难。

石油输出国组织还每年举行一次年会，邀请各大石油公司，没有参加组织的石油生产国家的代表如埃及、墨西哥、挪威等参加，同参加组织的国家的代表一起商讨石油市场情况和价格等问题。一些生产石油的大国如美国、苏联、英国等也被邀请作为观察员参加，但我国一直没有被邀请过。一些国家的大使对我说，很多石油部长已经提出，中国已是石油生产大国，应该邀请中国作为观察员参加，估计今年下半年举行的年会将会邀请我国参加。石油问题对我来说则完全是一个新问题，看来应该赶快从头学起来才行。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五日

上午，我去维也纳东郊的中央公墓门口的小教堂参加了一位奥地利老朋友的葬礼后，一看还有一些时间，就去凭吊我久已想去的闻名世界的音乐大师的墓地。我沿着公墓笔直的大道往里面走去，在大道的尽头，矗立着一座在 19 世纪初修建的巴洛克式大教堂。

在教堂前面左侧拐进去，沿着一条小路走不了几步，穿过一排松树，就看到了音乐大师的墓地。正面是一座用青铜制成的顶上站立着一个音乐女神雕像的莫扎特纪念碑。这是因为这位音乐大师 36 岁短暂的一生非常贫困和坎坷不幸，逝世后甚至买不起一块像样的墓地，只能埋葬在贫民的乱坟堆里。后来，他的朋友们凑钱为他修整了墓穴，并立了墓碑。由于有这一段值得纪念的历史，在 19 世纪末成立的奥音乐之友协会决定不把他的遗骨迁移到中央公墓的音乐大师墓地来，而是修建了一座纪念碑。莫扎特（1756—1791）和海顿（1732—1809）开创了欧洲古典主义音乐和歌剧的新时代，为维也纳成为世界音乐之乡奠定了基础。海顿的坟墓也不在中央公墓里，因为他过世前曾遗言希望安葬在他工作了近 30 年的在维也纳东北 20 多公里的铁城。

莫扎特纪念碑的后面是并排在一起的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坟墓。在贝多芬的白色大理石墓碑上，简朴地雕刻着一架涂了金的竖琴，下面写着：“贝多芬 1770—1827”。在舒伯特的同样是大理石的墓碑上，雕刻着一个音乐女神正在给舒伯特戴上桂冠，也写着：“舒伯特 1797—1828”。舒伯特比贝多芬小 27 岁，一直把自己看成是贝多芬的学生，在临终时要求同他埋葬在一起。他们生前都很清贫，原来都埋葬在一个小公墓里。到 1888 年，音乐之友协会才把他们一起迁移到中央公墓来，并按原样制作了较大的墓碑。贝多芬是德国人，后来在维也纳学习，成熟，和取得成功，把欧洲古典主义音乐推向了高峰。

舒伯特完成了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阶段，并成为过渡到浪漫主义音乐的桥梁。

在他们墓地的对面，是我们同样很敬仰的音乐大师勃拉姆斯（1833—1897）的坟墓。

在他的墓碑顶上，有一个他正对着乐谱沉思的胸像。在他墓地的旁边，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的坟墓，他的墓碑上镌刻着好几个音乐女神的浮雕，顶上有一个他微微笑着的头像，使人想起了他欢乐和诙谐的性格。

我沿着小径走过去，就是他同名的父亲和大弟弟约瑟夫的坟墓，他的小弟弟爱德华的墓地不在这里。他们父子四人开创了圆舞曲和轻歌剧的新时代，把祖国最美好的一切都编织到了他们的旋律中去，给世界带来了青春、欢乐和幸福。在这些音乐大师墓地的周围，还有许多著名的音乐、戏剧、艺术、文艺界人士的坟墓。

前来这里凭吊音乐大师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有很多是外国人，他们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但对音乐大师的怀念却是完全一样的，在每一个墓上都放满了他们带来的鲜花。

我在这墓地里徘徊良久，对这些艺术巨匠们奋斗的一生感慨不已，不禁想起了奥地利朋友常说的：多瑙河和维也纳森林孕育了无数的音乐巨匠，而他们的有声的诗篇又增添了音乐之乡的美丽可爱。

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前几天收到了部内转来的财政部给我们使馆的一封信件，说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国内正在研究成立审计署，要求使馆派人到在维也纳的国际审计长协会了解协会的性质和章程。

我们原先不知道在维也纳有这样一个机构，立刻给奥地利审计署打了电话，才知道国际审计长协会设在维也纳已多年，奥审计长就是这个协会的秘书长。

上午，我先拜访了奥审计长。在我说明来意后，他对我国长期未设审计长和审计组织感到非常惊讶，因而用不少时间向我解释了审计工作对经济建设特别是对财政的监督和审查、防止经费的浪费和贪污的重要性。

他对我国正在筹组审计组织感到高兴，希望加强奥中审计组织的往来和合作。

他说，奥地利的审计工作历史较长，经验也较多，因此国际审计长会议决定把协会的秘书处设在维也纳。

然后，他带我到离审计署不远的协会秘书处的办公室去。

协会在一座小楼的中间一层里，只有六个房间，工作人员五人，包括秘书长在内。

他看到我有些惊奇，笑笑说，如果我们开支太大，用人过多，我们怎能去审计人家呢？

正好在上几个星期，我国正在筹建的专利局的十多个同志来到维也纳接受专业培训。

使馆事先接到国内的通知说他们要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乘什么飞机来。他们是到了机场由奥地利专利局的车子接到旅馆后才给使馆打电话来的，我去看望他们时也才知道国际专利协会在荷兰，而其欧洲分会则在维也纳，同审计署一样，奥专利局长是分会的秘书长。

我国正在筹建中的专利局同他们联系后，他们立刻表示同意我们派人来培训，学习半个月，不收费用。

在培训结束时，奥专利局还送了每个同志不少专业的材料。

从这两件事来看，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还做得不深不细。

部内已多次指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使馆应把更多的精力转到研究经济工作上来，为国内的经济建设牵线搭桥，引进资金技术。奥地利虽然是一个小国，面积和人口比我国的浙江省还小，但是一个发达的国家，而且过去是一个大帝国，肯定有许多方面在我们经济建设中是可以借鉴的。但我们工作做得不够，心中无数，难以向国内提出意见，而是国内先发现了，再向我们提出来的。为此，我同使馆同志们一起又学习了部内的指示，研究了改进工作的方法。

每个同志都深感到，世界上经济技术形势发展很快，有很多新变化，新问题，新观点，我们还不学或者不太学，只有很好学习，才能跟上形势的发展，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内的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

这些天来，我一直忙于联合国妇女组织和青年组织分别在这里举行的妇女大会和青年大会。

妇女组织和青年组织在维也纳联合国组织中，是两个很小的组织，听起来名气很大，但经费很少，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平常没有什么活动。

这两个组织每 4 年差不多在同时开一次大会，与会代表的路费和食宿费用均自理，或由本人申请本国基金会赞助，所以多数国家不参加，参加国家的代表中大多数只有两三人，少数有五六人到十多人，而且西方国家的代表居多，因为申请基金会的赞助比较容易一些。

由于会议常常是在 6 月中夏季休假开始之前举行，代表们也好利用这个机会来一次“公费旅游”。

我国也没有派代表参加，所以一切都由我庖代了。

会议只开两天，讨论妇女和青年的一般福利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代表们各抒己见，没有什么争论。

我也各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

会场上人们走进走出，乱哄哄的，像在市场一样。会议结束之前，要推举下一届大会的正副主席，但这只是在开会时主持会议，休会时一点事也没有，绝大多数代表对此并不重视，因此采取协商的形式，不像联合国很多重要会议那样争吵激烈，还要进行投票。

会前，这两个组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美国里根总统的小女儿和罗马尼亚总统的大儿子要来参加会议。

罗马尼亚大使专门拜访了我，希望我在会上能支持他们总统的大儿子竞选青年大会的主席。

开会时，我先看到了里根的小女儿。

她是一个 20 多岁的普通的职业妇女，穿着很朴素，也没有涂脂抹粉。

她独立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公司里工作，并没有同父母生活在一起。而且，听说她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反对核武器核战争，同她实行强硬政策的父亲的政见完全不合。

她在代表团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团员，看不出比别人高一头，代表团也没有特别优待她，更没有要给她谋个妇女大会的主席当。

在开始时，我却没有看到罗马尼亚总统的大儿子，陪同他来的助手在替他开会，说他参观去了。直到闭幕会要推举新的主席副主席时，我才看到了他。

代表们在协商时大多数同意推选他为下一届大会的主席，也没有提出另外的人选。

他在当选后，得意洋洋地讲了很长的话，也不管别人是不是在听。后来，罗马尼亚大使看到我时，还对我的支持表示感谢，说罗马尼亚新闻媒体都在显著地位报道了他当选青年大会主席的消息。

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常常想起作为父母究竟应该怎样教育和对待自己的子女，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和不做些什么，什么对他们是好的和什么对他们是不好的。

八

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三日

这两天，我拜访了维也纳以西两个州上奥地利州和萨尔茨堡州的州长。

奥地利共有 9 个州，新大使到任后一般都要到各个州去作礼节性的拜访，并且进行一些参观。我去年 8 月到任后已拜访了 4 个州。维也纳是一个州，当然首先应该去的，下奥地利州在维也纳周围，州政府就在维也纳市郊，也已去过了。维也纳东面的布根兰州和南面的施蒂利亚州在今年春天分别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葡萄节和国际展览会，我也顺便去拜访了他们的州长。

1 日上午，我一早到了离维也纳 100 多公里的上奥州首府林茨。这个城市是奥重工业的中心，最大的钢铁公司和化工公司都在这里。今年我曾两次陪同来访的我国代表团参观了这两家公司，但没有去拜访州长和市长。上午拜会了州长后，他为我举行了午宴。

下午林茨市政府安排我参观了音乐大师布鲁克纳（1824—1896）的坟墓和其他一些景点。

布鲁克纳是与另一个音乐大师勃拉姆斯差不多同时期的音乐家，出生在上奥州的圣弗洛列恩镇。他的充满宗教气氛的乐曲我们国内的爱好者不很熟悉，他曾在维也纳音乐学院执教，音乐大师马勒是他的学生，他死后葬在故乡的教堂里。在林茨市长为我举行晚宴之前，我还自己乘车去看了林茨附近靠近德国边界的希特勒出生的小镇，他出生的那所小楼房还在。希特勒在 1938 年率大军从德国侵入奥地利时首先到了他出生地的林茨炫耀一番，再进军维也纳。市长在晚宴后，还安排一个小乐队为我演奏了布鲁克纳的乐曲。

我第二天一早就到了离维也纳 200 多公里的历史名城萨尔茨堡。这个城市在阿尔卑斯山东麓的山脚下，风光秀丽的高山牧场是旅游的一大景色。过去，周围地区盛产岩盐，因此称为萨尔茨堡，即盐城的意思。开创了欧洲古典主义音乐时代的音乐大师莫扎特 1756 年诞生在这里，更使这个城市闻名世界。萨尔茨堡在历史上长期是大主教统治的政教合一的地区，莫扎特的父亲就是教廷乐队的副指挥。莫扎特也曾在这个乐队工作过，后来成了乐队的指挥。但这个忠实于自己事业的音乐家在 25 岁时毅然断绝了同大主教的关系，走出了教廷，到维也纳献身于独立的音乐事业，终于取得了伟大成就。上午由市政府安排参观了莫扎特故居，在市中心一座楼房的顶上一层里，有几张后来画的莫扎特及其家人的油画像，陈列品很少。我拜会了州长，并参加了为我举行的午宴。下午他又邀请我听了在岩洞剧院演出的音乐会，这个剧院的舞台及后台都是从市内一座小山的岩壁上开挖出来的，观众席就设在岩洞口上，顶上有自动的厚厚的布篷，天气晴朗时可卷起布篷在露天观看演出。听说，这样的剧院还是世界之最，演莎士比亚戏剧的效果非常好。

这些年来，指挥大师卡拉扬在这里举办了复活节艺术节和圣灵降临音乐节，更使这里成为文化旅游名城。

这两天晚上，我都住在远郊农村的小旅舍里。这些小旅舍房间很清静，很卫生，饭菜也很新鲜，很清淡，像在家里一样。晚上，同老店主夫妇在电视机边聊天，可以知道许多民间情事。老店主说，有一年夏天休假季节里，基希施莱格总统夫妇在一个晚上自己开车来到这个小村子的一家小旅舍住下，这家的女店主看看总统的脸说，你好生脸熟。

他笑笑说，可能过去见过。到第二天总统走了以后，女店主才知道总统夫妇在她家里过了夜，奥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事业，大力鼓励农民在家里开设小旅舍，10 个床位以下不收税，但旅店服务包括设施、饭菜、卫生等必须按国家旅游局的规定办理。其实，这些小旅舍办得都很好，甚至比城里的旅馆还好，价格便宜很多。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

联邦德国参加中欧裁军谈判的大使晚上在维也纳著名的匈牙利饭店举行晚宴，招待北约和华约参加谈判的大使。今年5月中开始的第二回合的谈判仍是毫无结果地刚刚结束，代表们又要回去度暑假了。联邦德国大使是北约这一回合的发言人，轮到他在结束时作东。他还把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没有参加谈判的国家的大使包括英、法大使和我也请了去。这家百年老店在多瑙河岸上，今晚的月光分外明亮，银色的河水在餐厅的窗前缓缓流过，左侧山冈上已经沉睡的维也纳森林透出了星星点点的灯光。双方的客人虽然在这两个月的谈判中吵翻了天，但这样宁静的夜晚使大家都有了好心情，餐厅里充满了热烈的气氛。

谈判虽然没有取得一点进展，但并不妨碍联邦德国大使和作为华约这一回合的发言人的波兰大使在宴会的祝酒词中互相称赞对方的耐心和合作精神，并祝大家在暑假中愉快健康，到9月中第三回合再见。今晚的宴会根据大家的意见是自助热餐的形式，这样大家可以随意调换座位互相谈谈。开始时我正好同美国和苏联大使坐在一桌，他们都是谈判老手，又有多年交情，互相称名不称姓显得很亲热的样子，但他们刚吵了两个月，而且比谁都吵得凶。他们通过说笑话，讲空话，互相摸底，试探对方的反应，只有一次听起来说得比较露骨。苏联大使说，我已经把球抛到你那里了，等着你抛回来，而美国大使说，我先看看是什么球，才能抛回去。

我问到一位西方国家的大使这一回合的谈判是否有些进展，他笑着说，我不说你也知道，里根和勃列日涅夫正在以制裁、中程导弹、中子弹互相威胁，谈判能有进展吗？情况非常清楚，一是波兰局势恶化，去年8月波兰一些城市罢工，政府与团结工会的矛盾加剧，党和政府内部发生了分裂。8月部长会议主席巴比乌赫被赶下台，平科夫斯基接任，9月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又被撤换，卡尼亚继任。而在今年2月，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又接替了平科夫斯基。勃列日涅夫在波兰边境进行军事演习，里根4月写信给勃列日涅夫警告不要对波兰动武。二是里根说苏联在东欧部署SS—20中程导弹，也要在西欧部署潘兴 导弹和巡航导弹。

但另一位大使说，苏方在会上虽然态度很硬，不过在私下谈话中看来仍想达成某些协议的。估计是东欧局势不稳，除波兰外，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苏联国内经济困难加深，难以同美国继续进行军事竞赛，勃列日涅夫在今年2月23日到3月3日举行的苏共第26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已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听说勃列日涅夫的身体不太好。听美国同事说，苏方很想尽快开始同美国限制战略核武器第三阶段的日内瓦谈判。第二阶段达成协议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和勃列日涅夫在1979年6月18日都到维也纳来在协议书上签了字。里根虽然立场很硬，也不会放弃这条美苏单独对话的渠道。估计日内瓦谈判会在一阵讨价还价后开始。

这几天来，报纸透露苏联裁军谈判代表团正同维也纳市政当局商量，计划修建可容纳两三百人的办公楼和宿舍，他们虽然已来了7年多，但一直借用苏联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组织的房子，现在有了自己的修建计划，好像已下定决心安营扎寨要同对方周旋到底了。这个消息引起了西方谈判人员的注意，到处想方设法打听清楚。

今晚的宴会是这里外交界的非常典型的一幕，一方面是月色美景，酒绿灯红，另一方面却是唇枪舌剑，刀光剑影。我到维也纳已有一年，这样的

场面已看到不少了。

一九八一年八月九日

奥地利夏季休假季节已经开始，使馆的日常工作也随之减少了。使馆俱乐部拟好了旅游的计划，征求同志们的意见。平常的假日里，同志们只能在维也纳附近的景点去参观游览，只有在夏季休假时可以到远一些的地方去。但也有不少问题，主要是费用问题。

部内财政规定很严，是不给报销内部旅游费用的。所以，要一早出发，中午赶回来晚一些吃午饭，如果路途太远，只能带了吃的喝的，中午找个僻静处在汽车上吃。奥地利的博物馆、展览馆、故宫、故居等都不收门票，但游乐园、天然动物园之类要买门票，只有靠使馆少得可怜的“小金库”来付。奥方企业有时邀请中国客人参观访问，要使馆提供翻译，事后给他们一些报酬，当时规定这些钱都要缴公的，因此就归入了“小金库”。

当然，即使远一些也只能到附近的几个州，最西面靠近瑞士的两个州是山区，路又远，就去不成了。

国内的同志们在电影电视片中看到外交官又是干杯又是跳舞，好像生活很热闹，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而是相反，非常枯燥无味的。我作为大使外交活动最多，参赞一级少得多了，一般外交官除了出门办事，很少有外事活动，其他同志就不必说了。我尽量带一些同志一起去参加，特别是像看歌剧听音乐会之类，这样的机会也很少，我们很多同志在音乐之乡工作了四年，从来没有去过歌剧院和金色大厅。部内规定二等秘书以上的夫人可以到使馆来，使馆大部分同志的夫人都在国内，而且二等秘书以上的同志家里有小孩要考大学，不少夫人也没有来。但我们的同志比起其他使馆的同志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使馆就在市中心，距离维也纳市内一些著名的景点如故宫、展览馆、绘画馆、歌剧院、公园以及商业市街等都很近，同志们下班后可以出去散散步，逛逛街，很多使馆离市中心比较远甚至很远，就不可能了。

可是，我们使馆是一座过去贵族的老式住宅，不适宜合作办公和宿舍用。过去人家一层只住几个人，我们却要住 20 人左右，所以每层楼都像是“筒子楼”。这里只有公用的厕所和洗澡间，我住在三楼，也是一样，晚上要参加宴会招待会，就非提前洗澡不可。

使馆的人很多，一些年轻的同志还得两个人住一个小房间。办公室也很挤，小桌子摆得满满的，互相干扰很大，不少同志只能夜里加班。使馆里连个小花园也没有，只有一个小天井可以走一走。现在，部里知道我们的困难，已派了钓鱼台的 6 个工匠来，把大楼的阁楼改成 10 个房间，把我的办公室的一小半改成单独的厕所和洗澡间，还把原来的马房改成宿舍。同志们很高兴，轮流去当小工帮个忙。

我们使馆的人增加很快，已建立了教育处、科技处，其他各处也都增加不少，已到了近 80 人。而且，周围使馆到这里来采购的同志也很多，连会客室也住满了。到远一些的地方去旅游大家先要报名，一辆大客车装不下，分两批或三批去，路途远的，要两个司机去才能按时赶回来。同志们每个月的津贴很少，到外地去，有些公共厕所要收钱，说起来很惭愧也是由公家报销的。所以，每个使馆对俱乐部的工作都很重视，尽力使同志们的生活活跃一些，多样化一些，少枯燥一些。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七日

我参加智利大使主持的大使登山俱乐部以后，一直因为事情太忙，没

有参加过一次活动。前些天通知 8 月 17 日爬维也纳森林，我决定去了，因为 8 月份已是休假季节，我推不掉了，而且我还没有爬过维也纳森林，很想看一看。

今天一早我就乘汽车到了维也纳森林脚下的一个约定集合的小村子。

参加这次活动的有近二十个大使，几乎都是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外交部规定，大使赴任和返任，外交部将给他和夫人付来回路费，如果中间返国除了外交部通知回国述职外，一律自己出钱，再加上家属，这笔费用就不少了。所以，路途较远的国家的大使都不回国休假，就在驻在国或在附近国家度假。

智利大使是有登山经验的人，带了一个大背包，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有不少急救药品绑带之类，防止意外的事件。维也纳森林在多瑙河南岸阿尔卑斯山东麓的小山冈上，分有高的、中的和低的三条路线，每条路线的大树上都有红白油漆的记号，只要跟着地图上的记号走，就不会迷失在茫茫林海中。

智利大使征求大家意见后，决定走中的路线。智利大使走在前面，大家都跟上了。

我已多次去过维也纳森林，但都是乘汽车去的，走的是大路，看的是大景点。我真没有想到林海是如此之浩大和茂密，又是如此的清静和美丽。

维也纳森林在上个世纪只是在城市西部供皇公贵族打猎和散步的一片并不太大的森林，后来面积逐渐扩大，并且修建了不少城堡、教堂、修道院、别墅、旅馆等，小施特劳斯一曲《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更使这个地方在世界上出了大名。

现在，维也纳森林已是一个方圆 1200 多平方公里，200 多个村镇，20 多万人口的大地区了，而且大部分已不是在维也纳市，而是在下奥地利州了。

我们穿过茫茫林海，跨过潺潺溪流，走的大都是羊肠小道，有时连小路也没有，但一路上碧树浓荫，鸟语花香，真是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我们不少人常年住在城里，缺乏锻炼，走了一阵就感到很累，但走了一程就有一个农民经营的小店，卖些冷热饮料和食物，都非常清洁卫生。再走一大程，还有一家也是农民经营的店铺，供应正规热餐，出售土产品和纪念品，也可住一夜再走，服务之热心周到比城里的大宾馆还好。

我们爬到山顶后，还按奥地利人的习惯在小店里集体签名，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基希施莱格总统向他问候。

奥地利有春夏爬山、冬季滑雪的良好习惯，也是奥地利旅游的一大项目。奥地利每年有两千多万的外国游客，等于它人口的 3 倍多，各种设施非常先进齐全，服务热心周到，价格也很公道，受到国内外游客的欢迎。

这几年来我们旅游机构已多次派人来学习过，但好像还没有起到很明显的作，奥地利人常向我问到他们，还说有什么困难立刻告诉他们。

九

一九八一年八月三十日

昨天 11 时 31 分，3 个阿拉伯恐怖分子冲进维也纳市中心的犹太教堂，用冲锋枪射击教堂里的人，打死 2 人，打伤 20 多人，其中不少人重伤。巡警迅速赶到，制服了这些恐怖分子。今天上午，警局宣布又抓住了 8 个恐怖分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宣称，这次恐怖事件与解放组织没有关系。

在维也纳，与在其他西欧国家的首都一样，一再反映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尖锐矛盾。只要以色列对在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人发动了攻击，在西方国家的大城市内就会出现恐怖分子袭击犹太人及其商店和设施的事件。最严重的是 1975 年 12 月中阿拉伯恐怖分子袭击石油输出国组织部长会议的会场，劫持 11 个国家的石油部长的事件。这些年来，居住在维也纳的犹太人有不少增加。战后，逃亡到世界各地包括上海的犹太人有不少回到了维也纳和奥地利其他城市。在奥地利成为东西方的桥梁后，又有不少犹太人来到维也纳开公司和企业，做东西方的买卖。可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矛盾不解决，双方互相攻击，暗算和防范的活动就更难以解决，给奥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克赖斯基总理一直主张公正合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但遭到了美国的不满。里根总统已上任半年多，至今仍未派出驻奥大使。

奥地利自 1955 年成为永久中立的国家后，曾规定凡同奥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持外交护照的人均不必申请赴奥签证，可随时进入维也纳和奥其他城市。但这些年来，越来越多地发现一些恐怖分子和可疑分子持了假造的或买来的外交护照混入维也纳，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此，奥政府在不久之前取消了这个规定。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日

上午收到了一位美国眼科教授从纽约航寄给我的两张他在维也纳给我夫妇拍的照片，还附了一张写了些客气话的条子。我忽然看到了在信封上盖有一个英文写的“已经检查”的印戳，才发现这封信是被打开经过检查的。我不由得钦佩美国特工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本事。

我原来并不认识这位教授，上月中他和夫人同另一位耳科教授和夫人到维也纳来旅游。维也纳的一位眼科教授同他们都是在美国上学时的同学，邀请他们在维也纳近郊的酒店里尝新酒。他多次访问过我国，同我也是老朋友，因此也请我夫妇一起参加。尝新酒是维也纳除歌剧、音乐会之外，对旅游者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节目。多瑙河两岸盛产葡萄美酒，每年九月份开榨葡萄酿酒后，到年底年初葡萄酒刚刚成熟时，奥地利人都要到酒窖去品尝新酒，称为尝新酒。后来，他们把到酒店去喝酒都称为尝新酒了。在维也纳郊区和多瑙河两岸有许多种葡萄的农民开的小酒店，其中很多已是百年以上的老店了，但内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布置得极为淳朴，具有农村风味。客人们都坐在长木桌和长木凳上，品尝这家店主历年的佳酿美酒。在店堂的一角，有一个小乐队演奏圆舞曲和民歌，奥地利人都唱了起来，外国人不会，但调子很简单，听几遍也跟着唱起来了。

小乐队还走到桌子边来，请外国客人点他们本国的歌曲。他们会演奏世界各国最流行的歌曲，我也点了他们会演奏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到高潮时，大家更勾着臂膀摇摆着身子一起唱了起来，同一个桌子的很多客人原来并不认识，一下子就变成好朋友了。场面的热烈，气氛的温暖，使大家都感到了音乐之乡的深情厚谊。那位美国教授给我夫妇拍了好几张照片，在告别时答应给我们寄来。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九日

夏季休假刚刚结束，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就爆出了大新闻，两个苏联克格勃特务在盗窃工发组织的保密文件时失手被当场抓住。

这个消息是今天的维也纳报纸透露出来的，说这两个特务本来是工发组织的苏联雇员，利用夏季休假上班人少的机会，在下班前偷偷复制工发组织的保密文件，被某西方国家的雇员发现抓住。

一些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员和在工发组织的雇员就乘机煽动反苏气氛，并且影射批评工发组织领导特别是总干事汉斯·汗。

美国在不久前退出了工发组织，也借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早就发现工发组织的领导松弛，用人不当。

几天后，这两个苏联人就被解雇，回莫斯科去了。

苏联驻维也纳联合国组织的大使还对工发组织提出了抗议，谴责西方的反苏诽谤运动。

明眼人都知道，工发组织并没有什么很保密的文件。

工发组织的任务是推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业合作，所谓保密文件一部分是双方就合作项目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另一部分是工发组织官员到双方考察后写的报告和建议。而且，与对其他联合国组织和国际组织一样，不管是苏联还是美国安插在这个机构内的情报人员都不在少数，看到有些文件感到有兴趣而偷偷复制的也并不是什么秘密的了。只要美苏关系一发生紧张，这种本来司空见惯的事情就被大肆渲染了。

联合国机构一直是美苏激烈争斗的场所。美国凭借它的优势和影响，在联合国内同苏联抢人数，抢职位，抓住高级重要的职位不放手。工发组织在联合国内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机构，美国人兴趣不大，也不想出那么多钱，因此借口这个那个宣布退出了。接着，英国也退出去了。

美国老是指责这个机构开支太大，那个机构花钱过多，而且以退出作为要挟，但它欠联合国的钱却是最多的。

我国在工发组织工作的雇员只有六七人，翻译五六人，还有不少由工发组织资助临时前来学习，培训，进行合作的人员，一般是一个月到三个月。他们尤其是雇员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所处环境也很复杂。

我们的工发处是使馆的一部分，待遇同其他处的人员一样，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每月给很少的津贴。在工发组织工作的雇员和工作人员是挣工发组织较高工资的，但仍按使馆的标准实行供给制，他们在联合国食堂吃饭和其他开支日报日销。临时来工作的人员也是一样。

这种规定是长期来特别是“文革”以来的平均主义思想造成的，同志们有很大的意见，已提了很多的意见，国内还没有答复，但看来已越来越难以行得通，绝对平均是不可能的。我们使馆党委已向部内写过多次报告，建议恢复“文革”以前的低工资制。

一九八一年十月三日

每年9月底10月初，多瑙河两岸大片的葡萄熟了，家家户户都开榨葡萄酿酒。在匈牙利边境和在捷克边境的两个村子的朋友们都来了电话，邀请我们去摘葡萄。这是我们使馆自建立以来的老惯例，同志们忙过国庆节招待会后分批到这两个村子去摘葡萄，同他们已是老朋友老熟人了。

今天一早，我同一批同志乘车到靠匈牙利边境的铁城郊外的村子去。

铁城是音乐大师海顿的故乡，他逝世后葬在城内的教堂里，因此这个城市不大，但在世界上很有名。

我们到这个小村子后，就分散到各个农家去。热情的大娘大嫂们分给我们各人一双高统套鞋，一副手套和一把剪葡萄的剪子，就带我们到葡萄园去。

天气非常晴朗，淡淡的阳光照在昨夜刚下过雨的葡萄园上，真是令人感到青翠欲滴的美丽。一排排葡萄架上挂满了一串串青绿色的和暗红色的葡萄，已有好几个来打工的奥地利学生和亚非留学生在劳动。

我们先是把一串串葡萄剪下来，放在一个塑料桶里，装满后就提去倒在路口的拖拉机的挂斗里，拖拉机再送到村里去榨酒。劳动是很轻松愉快的，但大娘大嫂老担心累坏了我们这些外交官。

午餐就安排在地头，一条大长桌上摆满了烤鸡、烤肉、香肠、色拉等和香味四溢的葡萄酒。大家围坐在一起，又吃又喝，又说又笑，毫不客气地把食物一扫而光。

席间，村子里的小乐队奏起了当地的民歌，很多人跟着唱了起来，更使大家感到了这个音乐之乡的深情厚谊。

下午只劳动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就要我们休息了，到他们家里去看看他们的老奶奶，逗逗他们的小孙子。临走时，还要送我们各人两瓶家酿的葡萄酒，对我特别优待，再加上一包烤猪肉，然后一再互相拥抱，相约到葡萄酒成熟时再来尝新酒。

奥地利人有尝新酒的习惯，在酿酒过程中要尝三次之多。

第一次是在开榨后几天，葡萄汁刚刚发酵，有一点酒味，但仍很甜，称为“带酒味的葡萄汁”。第二次是三、四星期后，葡萄汁渐渐发酵，酒味已很重，叫做“有点劲儿”。

第三次是两个多月后，新酒刚刚成熟，但色泽还很混浊，味道也不很醇，到这时农民才完全放下心来，就要给这个新生婴儿“受洗礼”了，来尝新酒的人就更多了。

后来，奥地利人把到酒店去喝酒，也不管是喝新酒还是陈年老酒，都称为尝新酒。

奥地利人喜欢喝葡萄酒，而且喝法很考究，有许多的规矩，就像我们品茶一样。首先要看色泽，是否纯正；再闻闻味道，是否芬芳；然后喝上一大口，慢慢咽下去，品品酒质是否地道。此外，还要看看葡萄酒生产的年代和地区，哪个年代日照好，酒质就好一些，阴雨多，要差一些。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中欧裁军谈判今年第三回合的谈判从9月中开始只谈了一个多月，昨天中午就宣布会议中断散会了，也没有确定明年第一回合开会的日期，说是以后通过外交渠道再行商定，看来这次会议是不欢而散了。

我在一些招待会上问到几位西方国家的大使，他们笑笑说：“我不说，你也会知道，波兰局势混乱，美苏关系紧张，双方能谈得下去吗？”

这几月来，波兰局势越来越紧张，波兰领导人更换频繁，这里报刊估计波兰可能实行军管。

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才几个月的雅鲁泽尔斯基在10月16日又接替卡尼亚担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卡尼亚在去年9月6日被选为第一书记，今年7月14日在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上又连任第一书记，忽然在10月初宣布辞去这个职务。

8月初，波兰工人在首都华沙和其他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抗议供

应缺乏，物价高涨和失业严重，示威群众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出现了流血。

政府同工会的谈判一再破裂后，宣布成立了反危机指挥部。波兰人士对局势的发展普遍表示十分悲观。

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波兰的西里西亚举行了陆军演习，苏联、波兰和东德进行了海军演习。苏联领导人一再表示苏波关系是欧洲均势的柱石之一，决不会让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活动得逞。

里根一再警告决不容许苏联在波兰为所欲为，美国会通过法案，宣布如果苏联干涉波兰，将断绝同苏联的所有贸易，包括粮食在内。里根还宣布生产和储存中子弹。

苏联指责美国采取了极为危险的步骤，表示苏联决不会袖手旁观，将采取相应的措施。

但西方国家的大使认为，虽然谈判十分困难，但不会长期中断，明年初仍有可能达成协议，继续进行。苏美两国都不可能走得太远，特别是苏联，内外困难都很大。

他们要我注意最近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他说农业的生产和分配已成为苏联面临的重大问题，持续的干旱使农业三年连续没有完成计划。美国农业专家估计苏联连续三年只完成计划的 70%，今年内已进口粮食 4300 万吨。

因此，大使们认为，过一阵后，勃列日涅夫仍会推行缓和政策，提出某些新的建议，从苏联参加谈判的大使对西方的不少提议并没有完全封门，也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里根也受到内外的牵制，不可能为所欲为，仍会唱缓和的调子。

他们感到，更令人担心的倒是勃列日涅夫的接班人问题。他已 74 岁，身体听说有多种疾病。有可能接他的班的人如安德罗波夫 68 岁，契尔年科 70 岁，也都已年迈。谁能来接这个班，推行什么政策，一点也没有把握。

十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上午，我在商务处两个同志的陪同下访问了山区一家曾卖给我国奶牛的养牛农户。

阿尔卑斯山的东麓从德国进入奥地利蜿蜒在多瑙河两岸，一直到维也纳郊外。北岸冈岭向阳的山坡上是连绵的葡萄园，南岸山势渐高，是有名的高山牧场，养牛户居多。去年下半年，由于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广州、天津、北京等牛奶供应紧张，农业部及一些大城市的农业专家到欧洲来考察养殖业，准备引进一些优良品种的奶牛和瘦肉型猪。他们在德国考察结束后顺便来到奥地利，结果发现这里的奶牛品种好，价格也便宜，因此决定在这里购买。到今年 9 月底，已购买了 3 批，300 多头，分别由民航的飞机运到上海和天津。奥地利奶牛品种很多，选择的余地很大，但空运比较复杂，使馆商务处专门派了两个同志协助。奥方养牛协会对这笔能够压倒德国的买卖很高兴，已多次邀请我参观高山牧场和农户。

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雪，山区已进入了深秋。沿途山岭上层林尽染，绿的，黄的，红的，紫的，各种颜色交织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汽车驶进了深山，两边是各家农户一块块绿色的牧场，周边围着作为界桩的小树林带，一群群黑白色的或黄白色的奶牛星星点点地散布在毛茸茸的草地上，不时传来挂在牛颈子上的大铃铛发出的响声。汽车上了山顶，就到了这家养牛户的大平房的门口，年过半百的主人和老伴听到汽车声响就走了出来欢迎我们，领我们穿过拖拉机用的拱形的大木板门，走进右边收拾得非常干净的堂屋里，养牛协会的领导人已到了。好客的主人先请我们喝一杯烫手的称为“绿葡萄酒”的葡萄酒，说山区风寒已大，这种酒加了草药，可以避风寒防感冒。他介绍了他的牧场，他老夫妇和儿子媳妇共四口人，养了 80 多头奶牛和食用牛，在房屋后面，还养了 40 多头猪，现在主要劳动已机械化，购买饲料、农具及零件和出售牲畜、牛奶等都由农业合作协会办理了。他推开百页窗，山下就是他家的牧场，儿子正开着拖拉机在收割牧草并且打成大捆。主人又拿出他另一个儿子在山下葡萄园里新酿的葡萄酒请我们品尝，还没有尝到第四种，媳妇已在餐厅里摇起小铃要大家去吃她做的农家饭菜了。

可是，民航过去从来没有运过奶牛，这次要来回长途运送多次可大伤脑筋了。大家讨论了多次，决定用波音 707 飞机，在机舱里做了木头架子，奥方也派了两个人专门在机上稳定牛的情绪。可是，维也纳机场有整套的牛上飞机的设备，我国的机场却没有，大家又想办法做了牛下飞机的梯子。终于，第一次把 30 多头牛直飞运到了上海。第二次把木头架子改成了轻便的铝合金架子，又把 40 多头运到了北京，后来提高到了 50 多头，一共运了 200 多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奥方养牛协会还送了两大桶公牛的精液给国内，听说配种的效果也很好。国内已决定，明年除了继续买几百头奶牛外，还要买瘦肉型猪。

使馆商务处的两个同志中的一个将在年底调回国内，使馆决定等这件对人民生活十分重要的工作完成后再走。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九日

晚上，我参加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为我国的一个考察小组即将回国举行的宴会。

席间，小组的一位年纪较大的教授同我谈到了一个美籍华人大笔贷款的事，原来，这位教授在今年上半年去美国做了三个多月的访问学者，认识了一个美籍华人，说可以借给我国任何有兴趣的部门 30 亿美元的贷款，条件是要由中国银行担保。教授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回国后就向一些部门谈到了这件事。这些部门都在大力发展自己的事业，当然对这些贷款很感兴趣，希望他继续同这个人进一步商谈。不久，教授在同小组来到维也纳之前，就同他约定在维也纳见面。

我听了教授的介绍后，感到 30 亿美元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怎么由一个美籍华人同一个教授来谈这样的事，实在难以令人相信。自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上有不少骗子利用我国有些部门缺乏资金的困难，以贷款和合资作为诱饵来进行诈骗活动。所以，我坚持要教授在同这个人见面前后向中国银行请示汇报。果然，中国银行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说可告这个人暂不谈大笔 30 亿美元的事，先请他存一小笔 3000 万美元在中国银行一年或半年，乃至三个月，中国银行到时将按国际利率付给他利息。

不几天，教授同这个人见了面，按中国银行的意见告诉了他。他支吾

其词，说等他回美国后研究一下，再作答复。以后，他就没有了消息。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维也纳最高法院对修建维也纳新的综合医院的贪污受贿案作出了判决。主犯前院长有期徒刑 9 年，其他 8 名罪犯有期徒刑 4 年到两年半不等，另 3 名无罪释放。这个案件在维也纳和奥地利全国引起震动，不仅是奥地利第二共和国 1945 年成立以来最大的贪污受贿案，而且牵连到社会党政府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安德洛希。早在去年底，报刊揭露，安德洛希作为理事的他岳父的公司，在修建综合医院中接受了贿赂，因而他不得不从今年 1 月 1 日起辞去了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职务和联邦国民议会议员的地位。他是在 1979 年大选后担任这个政府职务的，被认为是已年迈的克赖斯基的接班人。

最高法院经过多月的调查后，在今年 9 月 8 日起开始进行审理。维也纳检察署听取了所有犯罪嫌疑人供词和一百多个证人的证词，整理了 6 万页的材料，包括近 200 页的供词。

维也纳审计署也对这个国家出资的重大项目的全部开支进行了审查，证实了贪污受贿的事实。维也纳报刊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引起了对社会党政府和维也纳市政府的广泛批评。联邦国民议会成立了议会三个政党的联合调查组，由反对党自由党的主席任组长，对这个大案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克赖斯基总理对此事表示遗憾，并说社会党全国理事会已一再劝告安德洛希在担任政府职务后应辞去公司理事的职位。报刊普遍认为，这个案件对社会党下次大选能否保持绝对多数会有很大影响。

这个案件是在去年底由倾向反对党的报纸揭露的，说安德洛希岳父的公司在修建综合医院中有受贿的嫌疑，两个反对党在议会中提出了质询，要求进行核查。不久，报刊又揭发安德洛希利用职权取得低息贷款在郊区盖了私人住宅。安德洛希不得不说明原委，宣布辞去所有职务。他只有 40 多岁，已担任过不少公私财务金融的职务，被认为是强有力的理财能手，政治前途无量。可是，他只担任了一年多的重要政府职务，就很快翻了船。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过了 12 月中，人们都忙着过圣诞节，使馆的工作很少了。我与使馆很多同志一起去参观了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故居”。奥地利人常常把这支名曲《蓝色的多瑙河》称为“第二国歌”，因为在全世界是如此的风行，人们一听到它，就会想起这位作者和他的祖国奥地利来。每年元旦的第一分钟，电台和电视台就响起这支充满乐观和信心的乐曲。

故居在穿过城区的多瑙运河和多瑙河之间的一条大街上，是一座沿街的粉红色的四层楼老公寓房子，它的拱形的大门，旧日走马车用的门廊，精雕细刻的屋檐和阳台，长长的四格木窗，显得很古色古香。施特劳斯曾住在这座房子二层楼上的两套房间里，于 1866 年末到 1867 年初在这里谱写了《蓝色的多瑙河》这支名曲。那时他已 42 岁，在维也纳音乐界中负有盛名，但只是在这支乐曲问世以后，才奠定了他“圆舞曲之王”的地位。

这座房子距多瑙河不远，步行约半个多小时，当时还是一片大森林，施特劳斯常常穿过森林到河边去散步，现在房屋已鳞次栉比，成为热闹大街了。

维也纳市政府在 1952 年收购了施特劳斯住过的两套房间中的一套，辟为“蓝色多瑙河故居”，一共有大小四个房间，包括施特劳斯的工作室在内。这些年来，市政府花了很大的气力才收购到了少量他生前用过的乐器、家具

和日用物件。在故居的两个小房间里，陈列着他本人、家属和亲友的照片，《蓝色的多瑙河》乐谱的各种版本，在世界各地演出的海报，节目单，照片和报刊评论等。在他的工作室里，展览着他的一架钢琴，几把提琴，一个工作台和一个衣柜。高大结实的工作台是用硬木制成的，他喜欢站着工作，身体伏在工作台上把心灵中的音符写在稿子上，再从旁边的小桌上拿起提琴试奏一下，然后提笔修改或撕掉重写。在另一个房间内陈列着这支乐曲的各种手稿，说明了这支名曲诞生的艰辛的历程。

人们都知道，这支名曲是一支乐观主义的颂歌，只要回顾它产生的经过和背景，就更清楚了。1865年，维也纳男声合唱团要求施特劳斯为他们谱写一首歌曲，他答应了，但过了一年多还未能交稿。突然，在1867年初，他把乐曲送到了合唱团。大家高兴地把乐曲试奏了几遍，觉得充满了激情和信心，对人们将起鼓舞和兴奋的作用。因为在半年前即1866年夏季，奥地利在同普鲁士的战争中打了败仗，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群众情绪非常低落，对前途缺乏信心。合唱团感到这首乐观主义的乐曲将会帮助群众医治心理上的创伤，立刻请诗人魏尔填了歌词。那时，很多歌曲是先谱曲，再填词的。所以，魏尔最初的歌词是：“维也纳人，欢乐起来吧！”那些天里，施特劳斯不断地修改乐曲，魏尔也不断地改写歌词，最后的歌词是：“春天来到了，大地在欢笑。”（我国内出版的外国歌曲选中根据的就是这一种歌词）。合唱团在1867年2月17日在维也纳狄爱娜大厅首次演出这首歌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不久，歌曲又在巴黎上演，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一百多年来，这首歌曲在全世界风行一时，深入人心，给人们带来了青春和欢乐，活力和信念，使他们信心百倍，勇往直前。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晚上我夫妇应一位老商人夫妇的邀请到他在维也纳郊外的家里去过圣诞夜。这是我第一次在外国朋友家里过这个节日，因为这在西方国家是一个全家团圆的节日，一般是不邀请其他亲戚和朋友的。这位商人是我两位前任的老朋友，我接任后也成了老朋友，他常邀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饭、散步和游泳，是很熟悉的。

他的家在维也纳森林的脚下，周围一片寂静。客厅里的大圣诞树上发出彩色的光亮，音响箱里传来低低的圣诞乐曲的声音。我们喝着老先生买来的陈年香槟酒，又尝着老太太做的家乡的饭菜。老先生已近70了，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圣诞夜不吃肉只吃鱼。

他们是孤老两个，也邀请我们两个共度佳节。我们初到时以为他们没有子女，后来我老伴听他夫人说有一个女儿在萨尔茨堡与丈夫一起经商，两个小孩已上小学了。我们好生奇怪，怎么没有看见他们来往过，究竟是什么原因。

后来，这个谜终于解开了。这是一个很不幸的故事，战争的创伤像一堵墙把他们三个人隔离开来了。1938年希特勒侵占了奥地利，变成了德国的一个州。二战时，我的这个朋友应征入伍，在斯大林格勒的血战中幸免一死，在苏联战俘营里劳动了四年多。到1948年他被释放回国时，发现他妻子在战争期间同别人生的一个女孩已三岁多了。他非常恼怒，发誓绝不愿意见到这个孩子。他妻子只能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偶然找个机会偷偷去看望她。女儿逐渐长大，一直在寄宿学校里上学，从来没有回家过。到中学毕业后再也不愿继续上学，嫁给了一个在萨尔茨堡的比她年龄大得多的商人。

他们夫妇一直在这样的阴影下生活，虽然随着年龄的增加关系有所缓和，但精神上的隔阂始终难以消除。他常为了一些小事生气，妻子总觉得做错了事对不起他，从来不回一句话，只有跑到另一间房间去暗暗流泪。我们深深感到，大战已过去多年，战争的破坏也已恢复，但战争对人们对家庭造成的创伤却难以消除。

我们的朋友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喜欢吃中国饭菜，因而从中国饭店买来了好多道菜，吃了快两个多小时。直到大厅里的座钟打响了十二下，宣告圣诞节已来到了。他们夫妇就带我们到大圣诞树下，他们夫妇先交换了早已放在圣诞树下用彩色礼纸包好的礼物，各人打开看看是什么礼物，根据西方的习惯事先是保持秘密的。然后，他们又把树底下的两包礼物送给我们，打开一看我的是两瓶法国葡萄酒，我老伴是一盒化妆品。我们又回到餐桌去，拿起香槟酒杯互相干杯，祝圣诞快乐，音响箱里圣诞乐曲的声音已放大了。

忽然，我的朋友哭了起来，我和老伴都已知道这件事，我的两位前任都告诉过我们，这位朋友在圣诞来临时都要痛哭一场。究竟是什么原因，当然也不便问他。他夫人说他常常感到自己年纪大了，过去打仗时负过伤，现在心脏病严重，能活在世上一年比一年少了。这是一个原因，但看来还有别的原因，他常同我谈到他经商还不错，但他一生很不幸，每当看到其他的人很愉快很幸运的时候，心里就感到很难过很孤独。他哭得很伤心，妻子可能见得多了，坐在那里不说话，我们也没法劝他。他哭了约十多分钟，就用餐纸擦了眼睛，说非常抱歉，又拿起酒杯同我们干杯了。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和老伴在晚上 21 时应一位医生老朋友夫妇的邀请到他家去共度除夕之夜，这位医生爱好音乐，是个业余的钢琴名手，常到欧洲各地去演出，他弹奏钢琴的名气超过了他看病的名气。每当除夕之夜，他常邀请几个老朋友和歌剧红星到他家去迎接新的一年。

穿着黑色夜礼服的老医生在他夫人给我们几个坐在沙发上的客人送上香槟酒以后，走到客厅一侧的钢琴边去，彬彬有礼地对我们说，他邀请的两位歌星还在轻歌剧院演出今年最后的一场轻歌剧，要到 23 时左右卸装以后才能来。他愿为大家弹上一曲，祝愿明年好运。他弹得很有感情，不愧是个名手。在维也纳这样的家庭音乐会常有，逢年过节时更多。

23 时过了不久，两位男女歌星兴高采烈地走进了客厅。走在前面的女歌星大约二十七八岁，长得很漂亮，估计在舞台上扮相更俊俏，也稍稍有些发胖，看上去有些高傲。

她穿着黑色长夜礼服，脖子上挂着一串发光的钻石项链，胸前缀着一朵镶嵌红宝石的白金的胸花，显得境况富有和懂得打扮。在后面的男歌星已是 40 开外的中年人，身材高大，肩背笔直，脸上虽然已沾岁月的风霜，但仍显得很英俊，在舞台上还会是令人喜爱的小生。老医生给我们介绍说，这位女歌星是颗刚刚发出光芒的新星，从音乐学院走上舞台才 4 年多，就令许多的观众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那个男歌星不必多加介绍，已是大家都熟悉的舞台上的白马王子，现在已成了女歌星的白马王子。他们两位的心情都很好，今晚的演出很成功，谢幕达十多次之多。后面进来的是一个年纪较大的秃顶的商人，他是这个女歌星的爱好者协会的会长，这对歌星走红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到维也纳以后，已多次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女歌星演出的轻歌剧，她

嗓子很好，扮相也出众，也常在一些社交场合露面，在报刊上更时常看到她的倩影和加油添醋的消息。

但有的报刊也提醒这个涉世未深的女歌星说，当今的舞台已从艺术创造的殿堂变成名利交易的场所，那种尔虞我诈的关系和花天酒地的生活有可能像有的新星一样，还没有发出光亮就被这个社会吞噬了。她的白马王子我在德国工作时曾多次看过他的演出，确实是令人喜爱的小生，他像很多走红的歌星和影星一样，由于到处受到捧场而显得有些高傲和做作。

老医生夫妇准备了很精美的夜餐。在吃饭的时候，我看到了女歌星的另外一面，即在社交场合的才能。她很聪明，又机灵，很会解人心意，讨人喜欢，常常引起满座笑声，成为全场的主角。她的白马王子对她也大献殷勤和捧场，令人感到庸俗，不免想起了有的报刊谈到的一些新星还没有发出光亮就在世俗中陨落了。

不一会，电视里响起了新年的钟声。老医生家正好在市中心广场附近，前后升起了各种各样色彩和响声的焰火和爆竹，客厅里的大灯早已被女主人关上，屋外彩色的光亮使客厅变成童话般的世界。接着，电视里面响起了《蓝色的多瑙河》的乐声，1982年来临了。女主人和女歌星都根据奥地利人的习惯，拿了香槟酒杯同大家干杯，分给我们用巧克力和塑料做的小猪和马蹄，祝福在新的一年里好运。

